



抢救记忆 追寻真相 交流信息 积累资料

第 16 期 2012 年 5 月 30 日

目 录

【按“Ctrl”键+鼠标点击篇名选择】

“右派”群体的组成与征貌（节录）●牛立华	2
“右派”的数字哪个“靠谱”？●木 人	7
我所认识的“右派”——纪念反右运动五十五周年●吴兴勇	9
“红歌”记忆及其他●黄晓龙	14
欧洲旅游醒脑记●林宪君	23
“家庭出身”的符咒●○冰玄	39

《巴山夜雨》电子邮箱：bsyy1957@Yahoo.cn

“右派”群体的组成与征貌

（节录）

牛立华

1957年夏，一个戴着红领巾长大的、笃信共产教义、热爱祖国的共青团员、军工企业的技术员，一夜之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因在给同学的私信中写了“反右不讲道理，是形而上学扣帽子”，晋升为“极右分子”，送劳动教养。1961年解除劳教后被强制留在劳教场所，从精神到肉体，从形式到内容，仍被当作专政对象。1965年，我写了一个思想汇报，开宗明义地说：“我不翻案，不因个人问题否定伟大的政治运动；五七年的后果是自己造成的，不把责任推之于党。只希望在摘掉帽子多年以后得到党的理解和任用，或者说谅解和宽恕，允许我回到人民行列里来。”孰料此思想汇报被定性为“狂妄叫嚣翻案”，文革初期被捕入狱。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不经调查、不加审讯、不容申辩、又不准上诉这样一种极端反常的手段判处我有期徒刑十五年——唯一的罪状是“借开会暴露思想和借口向管教干部暴露思想公开讲反革命言论”。发往深山服苦役。因无罪可认，被反剪双手带上特制的铁铐，关在三平方米左右的黑牢中。历经九死一生，1979年荣获“改正”。我今天还活着。还能看到民主、自由的潮流日益汹涌，无论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中国人民必将走上民主之路并取得最后胜利。

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五十五年，遭此厄运的人们，在心灵与肉体备受煎熬的炼狱中，耗尽了人生的黄金时段，相当多数经不起残酷的折磨，含冤离开了人世，至今仍活着的也已年逾古稀，垂垂老矣。研究这场悲剧的起因、过程、结局、后果，并不仅仅是伸冤，也不仅仅是伤感，而是希望类似的悲剧不再重演。这一切都离不开调查、分析、统计每个右派分子的遭遇和经历，由于涉及人数高达数百万，且当局对反右档案百般封锁，此项研究实难进行。以中共之作风，为掩饰其罪恶，不仅会隐瞒真相、封锁信息，还很可能大量销毁资料，或许这将是 2 中国历史永远的遗憾。

1957年7月，毛泽东在青岛会议上凶神恶煞地将“右派”定义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于是以蒙蔽和威胁的手段运动群众，大张旗鼓地反右，短短数月间即抓出了五十五万多“右派分子”。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危言耸听地宣称“右派分子”“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仍然肯定反右是正确的。

按照毛泽东和中共的预想，清除了“右派分子”就该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了吧，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右恶果暴露得日益清晰。人们看到了，1957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每下愈况；毛泽东叫嚷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不过是垂死的狂人臆造的谬论；中共片面强调阶级斗争，人为制造矛盾，使全国人民饱受精神桎梏，处在人人自危的恐怖氛围之中，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等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让亿万民众蒙受了灭绝人性的灾难与浩劫。在严峻的事实面前，嘴里高喊着“实事求是”的党政要员没有一个敢于触动毛泽东的逆鳞，直到混世魔王死了以后，中共才不得不承认反右是重大失误，但是仍然没有坦承错误的勇气，也没有彻底纠正错误的决心。在邓小平的主使下，把动机、手段、结果、理论、实践都错了的反右运动，既轻描淡写又荒谬绝伦地说成是“扩大化”，于是来了个不明不白的“改正”，而不是甄别平反。

中共中央在反右二十二年后才遮遮掩掩地承认当年并没有那么多“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1978年复查确认，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八的“右派”均系错划。全国只留下九十六名不予改正，用以遮人耳目。事实上，当时根本不存在意欲篡党夺权的“右派分子”，“右派”群体是毛泽东及其帮凶无中生有制造出来的。

这个群体人数众多：中共正式宣布的“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三千余人，被冠以“中右”、“暗右”、“内控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名目的四百余万。

年龄跨越很大：从十二岁到一百一十八岁，童叟不限；

文化参差不齐：从小学生到博士后，兼收并蓄；

行业范围甚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研、新闻、出版、卫生、军队、演艺，无所不包；

职务千差万别：书记、省长、学者、作家、教授、编辑、记者、医生、军官，纷纷入围；

三教九流俱在：主教、牧师、阿訇、和尚、尼姑、道士、唱京戏的、演评剧的、说相声的、讲评书的、唱大鼓的、演杂技的，在劫难逃。

他们当中有：（名单从略）

以上所载不过一百余名，属名人之列（高级官员，著名学者、民主党派领导人、其他社会名流），可称为知名“右派”，是五十五万三千多“右派分子”的五千分之一。若按三百多万“右派分子”计，则仅仅是三万分之一。

从总体上看，绝大多数“右派分子”或者说“右派”的主体均非知名人士，只是有一些文化的普通老百姓。

近二十多年，一些记述反右运动的论著和追忆个人苦难史的回忆录冲破层层禁锢陆续问世。叶永烈的《反右派始末》、郭道晖的《五七风云》、丁抒的《阳谋》、朱正的《一九五七年的夏季》、胡平的《禅机——1957 苦难的祭坛》，以及戴煌的《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和凤鸣的《经历我的 1957 年》、巫宁坤的《一滴泪》、石天河的《逝川忆语》、张先痴的《格拉古轶事》、陆清福的《左右春秋》等均有相当读者。前几部专著基本勾画了反右运动的来龙去脉和毛泽东翻云覆雨、做张做致的表现，以及社会名流被打成“右派”前后的遭遇。后几部自传体作品则以深沉悲抑的笔触记录了个人在社会底层乃至监狱中惨不忍睹的苦难经历。不无遗憾的是，已发表的著作对知名人士的描述较多，对在数量上占绝对多数的普通“右派”群体很少提及，或者说，这些专著只记述了反右运动的某个局部，未能概括其全貌。事实上，社会名流和基层群众中的反右运动在时间先后、斗争形式、打击力度、处理方法上是有很大差异的。尽可能充分地研究反右运动的各个侧面才能够真正了解和评价这个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的政治灾难。

2008 年，广东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李若建博士曾对这个被忽略的群体进行过开拓性的研究，发表了论文《庶民右派：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香港地区的陈榆林、凌文秀、岑超南诸先生编辑出版了《五七右派列传》；成都的冉云飞先生收集整理了《右派资料知见录》等史料；寓居北京的老记者铁流编辑印刷了《往事微痕》，刊出上千万字的历史文稿；北京大学焦国标先生收集、整理、编辑了《黑五类忆旧》。他们的工作深受五七难友的赞誉和支持，也希望今后有更多优秀的作品出现，聚沙成塔，为五七年那场运动留下全面的、真实的、立体的记录。

笔者仅就个人所见，对基层的反右群体概况略作描述，聊以填补空缺，权充引玉之砖。

（一）右派分子的年龄段

我所在的原单位——重庆长江电工厂，1957年划了二十几名“右派分子”，年龄最大的保密科副科长张子敬不过三十四岁，医院党支部书记黄光禄三十二岁，机关党支部书记吴超三十岁，其余的均在三十岁以下。

投入劳教、劳改以后，我历经新建机械厂、劳改局加工厂、四川磨床厂、通惠汽车修配厂、四川消防机械厂、苗溪茶厂，耗去二十三年。虽然对各单位“右派分子”的具体数目和年龄分布无法详实统计，但也有概略的了解。仔细回想，大多数被划为“右派”的是二十岁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如果将“右派”人数和年龄画成正态分布曲线，这个年龄段即是突兀的山峰。在写回忆录的时候，查阅相关资料发现，最小的是只有十二岁的小学生，最大的是一百一十八岁的老和尚。稚气未消、不知“党”为何物的儿童以及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僧人都被带上“反党”的帽子，堪称中共之杰作，世界之奇闻。小学生在劳改场所改造了二十多年，得了个“改正”通知书，总算活出来了。老和尚被关进牛棚，因年迈体衰，受不了折磨，不久就魂归离恨天、面见佛祖去了。

现摘录几位小难友的简况如下：

1、**张克锦**，四川达县地区通川（今达州市通川区）人。反右运动初期，中共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当时四川达县一家鞋帽生产合作社的职工冉某，给城关镇某位领导提意见，大字报中附有一幅含有喻讽之意的漫画。冉某由此被划为“右派”，不久跳大桥自杀身亡。那位镇领导犹不罢休，查出漫画系张克锦所画，当时张克锦只有十二岁，尚在小学读书，五年级，对鸣放之事毫不了解，他及他的家人与该镇领导互不相识，素无瓜葛芥蒂。只因张克锦从小有绘画天赋，曾获得过少儿绘画大奖，小有名气，邻居冉某请其帮忙画了一幅题为《一手遮天的XXX》漫画，不料闯了大祸。1958年4月被抓捕入狱，有关领导认真研究后认为，把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叫做“右派分子”似难以服众，于是创造性地冠以“右童分子”之名，将其入狱关押，七年后刑满，继续苦受折磨。二十一年后的1979年，达县通川区第一小学收到《平反通知书》，方摘帽、改正。退休前系达州市通川区总工会工人文化宫美术专业干部。张克锦爱好广泛，除绘画、书法外，尤喜读书、集邮，亦为京剧票友，拉琴吊嗓，自娱自乐。目前仍健在。

2、**佟信顺**（1942-1960），河北省人，家庭三代都是工人。他身材矮小，性格懦弱，北京冶金中等专业学校学生。1957年整风之际，他给美国总统写了一封信，试图探问美国的民主是什么形式。信投在邮筒里，不知怎么却到了学校党总支书记手里，是邮递员的误投吗？书记说：“就凭你给我们头号敌人——美帝的头子写信，就能打你个‘极右分子’！”于是，十六岁的佟信顺以“右派”罪名送清河茶淀农场劳动教养。1960年大饥荒中冻饿而死，他哥哥到农场收尸，泪流满面地反复喊着一句话：“他还是个孩子呀，他还是个孩子呀……”

3、**李曰垓**（1941-2010），云南昭通人。1941年12月23日出生，自幼聪颖好学，十三岁初中毕业，被昭通专署招募为通讯员，后任机要员，负责保管文件、电报、档案。1957年夏天，他只有十五岁半，少不更事，不懂得巴结上级，没有遵照其顶头上司某专员的意图修改这位专员的私人档案，为其文过饰非，隐恶扬善，即被该专员借反右之机暗中定为“右派分子”，成了少年政治犯、思想犯。1958年，刚满16岁的李曰垓，被戴上“右派”帽子送劳动教养。从1958年元旦开始至1978年底，度过了二十年零八个月的铁窗岁月，其间因不认罪，三次遭到逮捕，关入监狱，长期戴脚镣手铐，禁闭在单人牢房……有关他的档案材料多达300万字。在“右派”中算得上是异类。1979年“改正”以后在昭通中等专业学校任语文教师，2010年4月26日因心肌梗阻在云南逝世。其遗著《生命燃烧于暗夜》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4、**王安琪**，辽宁锦州人。1957年，十七岁的王安琪以优异成绩考入吉林大学物理系，作为秋季刚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躲过了“鸣放”阶段，在反右中没有出格的表现，但他自

视甚高，对已经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妄加议论，偶有与党委不同的见解，因而受到批评。在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中受到批斗，本为小事一桩，他却极为抵触，持才傲上，顽强抗争。由此被开除学籍，遣返回乡，劳动改造。在社会底层挣扎了二十余年，1979年始得“改正”。如今也已年逾古稀了。

5、汤朴胜，别名费彝生，四川岳池人。其祖父早年曾参加同盟会，二十年代组织“川北民军”反对当地军阀，1932年被杀害于南充，1986年经民政部追认为烈士。其父为国民党军统财务处长，1949年参加起义，皈依中共。费彝生十七岁考入西南师范大学数学系，入学不久即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获“改正”。

1998年秋，其母校召开国庆、中秋茶话会时，费彝生朗读了一副自撰的对联：

封建军阀之孙，军统特务之子，狗崽子当然是血统反共小右派。

革命烈士吾祖，起义将领吾父。汤朴胜无愧于数学教育大教授。

横批是“拨乱反正”。

由此对联可略见其身世和自视甚高、桀骜不驯的个性。

6、李天德，1939年生于四川荣县。其父李佛海靠染布谋生，1942年遭日本空袭蒙难。十一岁时，其母病逝，随长兄度日，十二岁入少先队，十五岁入共青团，十六岁考入重庆大学冶金系。李天德家境困苦，但聪颖好学、兴趣广泛，进入重庆大学后被推举为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1957年反右中划为“右派分子”，监督劳动期间，曾与云南籍“右派”同学商量，想去云南谋生，尚未成行即被认定“妄图偷越国境”，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满后被强制留场就业。1965年又以写反动剧本之罪名判处六年徒刑，1975年李天德写了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的万言书《献国策》（该件曾一度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否定文革和“三面红旗”等极左路线。1976年2月，雅安地区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李天德死刑，后经雅安地区中级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年。毛泽东死了三年以后，李天德始获平反。

年龄大的右派分子多为社会知名人士——

虚云禅师一百一十八岁；吴德正大阿訇一百零七岁；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七十岁……还有冒广生八十六岁；张申府六十四岁；章伯钧六十二岁；罗隆基六十一岁；章乃器六十岁……

这里也记录几位年长右派的简况：

1、虚云禅师（1840-1959），湖南湘乡人。俗姓肖，初名古岩，字德清。十九岁至福建鼓山涌泉寺出家，二十七岁离鼓山，先后在江浙名山大刹参访耆宿，研习经教，参究禅宗。此后又云游陕西终南山、四川峨眉山、拉萨三大寺，并由西藏到印度、锡兰、缅甸等国，朝礼佛迹。由缅甸回国后，朝拜云南鸡足山，经贵州、湖南、湖北等地，礼安徽九华山，再至扬州高旻寺参加禅七法会，1918年主持昆明云栖寺修复，同时参与或主持兴福寺、节竹寺、胜因寺、松隐寺、太华寺、普贤寺等的修复。虚云禅师数十年全心护持祖庭，兴规矩，肃寺风，颁规约，创办佛学院，培育僧才。同时，广结外缘，多方募化，修葺寺宇，重建楼阁，添买田亩，兴办林场，弘扬农禅，深孚众望。

1951年镇反运动中，地方干部怀疑逃亡地主和土匪潜藏在云门寺，且猜测云门寺有大量金银财宝。于是派民兵百余人包围了云门寺，将老和尚及百余僧侣分别囚于禅堂及法堂，大事搜索，上自瓦盖，下及地砖，搜了两日，未搜到金银财物，乃殴打众僧，亦无所获，数名大汉以木棒铁棍殴打年逾百岁的虚云老和尚，逼其交出金银财物，打得老和尚五窍流血，肋骨断折。打手们见寺庙确无财宝可寻，才离去。直到五月间“云门事变”传到韶州，大鉴寺僧人通知海内外同门，联合营救。北京当局电令地方政府严查，云门之围始解。

1952年4月，周恩来为控制佛教僧众，粉饰宗教自由，电邀虚云禅师离云门北上，李济深、陈铭枢、叶遐庵、赵朴初等迎老和尚于火车站，驻锡于北京什刹海附近的广化寺。11月在北京出

席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会议，并被推为首席发起人。在虚云老和尚向中央政府的呈书中，他力请中央政府规定人民有信仰宗教之自由，提出了不许再拆寺院、毁佛像、焚经书，不许强逼僧尼还俗，按僧众人数分配田亩等寺院保护管理办法。

1953年6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正式成立，虚云被选举为名誉会长。是年，虚云被聘为全国政协委员。

1955年，虚云老和尚不满人民信仰受到压制，拒绝出任佛教协会会长，1957年被内定为右派。遣送江西监督劳动。

1959年10月13日，虚云法师在江西云居山真如寺圆寂。世寿120岁。

2、吴德正大阿訇（1851—1959），宁夏泾源县人。1862年，陕西回民起义暴发，吴德正随义军餐风露宿，辗转西北五省，历时十年，跋涉数万里，战乱后，在泾源县定居，投入清真寺习学经典，四十岁以后，在包头、绥远（呼市）、固原、泾源等大清真寺任教，历七十个春秋。1952年高寿一百零一时，辞学回家养老。五八劫难期间，对百岁老阿訇也不放过，在固原参加阿訇集训，遭受数月批斗，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交给生产队监督改造，1959年斋月来临之际，历经三朝，饱经风霜的吴德正阿訇，含冤离开人世。

3、冒广生（1873—1959），江苏如皋人。十七岁参加县试，取得第一名。翌年参加府试，再取第一，中了秀才。二十一岁参加科举考试，又考取第一，中了举人，由此名声大震。冒广生功校讎、善诗词、勤著述，抗战期间曾任国史馆编纂。1957年春，冒广生撰写了《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发表于《人民日报》，引起毛泽东注意。六月某日深夜，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接见冒广生（其子冒舒湮陪同拜见），接见时冒老坦言说：“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过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虬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毛泽东以手捂胸从容答曰：“我一定牢记在心上。”1958年冒氏父子皆被入围“右派”行列。

4、陈再励（1887—1975），湖南省平江市人。少年时在造纸作坊做童工，1925年加入中共，组织工人罢工。1928年参加平江暴动。抗战初期任新四军民运部长，1943年调入延安，为中共七大代表。后随军进入东北，任民运部长和组织部长。1957年任广西副省长，省委常委。1957年6月，他针对广西饿死人事件提出要向中央如实汇报，核实产量，下拨粮食。大声疾呼：“不能高高在上，不关心群众死活。”这些言行得罪了省委主要领导刘建勋等人，于是趁毛泽东到广西视察时反映陈再励“诋毁农业合作化”，“攻击党的正确领导”。毛泽东听罢大为震怒，立即宣布将陈再励和支持他的几个省级干部打成“陈王骆王廖廖右派反党集团”，开除党籍，遣送各地劳动。1975年陈再励含冤病逝于长沙。1979年，中共中央和广西省委决定为陈再励、王梦周、骆明、王浩、廖原、廖联原等六人改正和平反。

5、张申府（1893—1986），原名张崧年，河北献县人。1913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7年北大聘其为助教，在此期间和李大钊、陈独秀相识，他们三人于1918年创办了《每周评论》。1920年，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维金斯基来华，拟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李大钊、陈独秀，张申府三人组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基层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和1922年先后介绍张国焘、周恩来、朱德、孙炳文等加入共产党。192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党的纲领时，因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与蔡和森、张太雷等发生争执，愤然退党。此后以教学和翻译、著述为生，先后在暨南大学、大陆大学、大夏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并参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邓演达、章伯钧、黄琪翔等人组建民主党派的活动。1948年在《观察》杂志发表了题为《呼吁和平》的文章，被中共认为是为蒋介石争取喘息机会。中共建国后，张申府被全面封杀，不准出面，不准说话，不准发表文章，他只能在孤寂冷清中度过余生。周恩来安排他在北京图书馆当了一名研究员，靠微薄

薪金为生。1957 年划为“右派分子”，文革中再受冲击，1979 年获彻底平反，1986 年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6、程星龄（1900-1987），湖南醴陵人，国民党一级上将程潜的族弟。1926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教育系，1927 年投笔从戎，参加北伐，因不满蒋介石专断，愤然离职。先后在上海劳动大学、安徽宿县煤矿、北平故宫博物院等地任职。1945 年底，因与中共某些人士关系密切，以“包庇共产党员”罪被捕，关押在台湾，1947 年经刘斐等联名担保获释。1948 年 8 月，应同乡好友余志宏（中共党员，时任湖南省工委代表）之邀，冒死从台湾经香港回到长沙，策动程潜、陈明仁起义成功，被邀参加开国大典，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并称他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五十年代任湖南省副省长兼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7 年被毛泽东钦点为“右派分子”，1978 年获“改正”。1987 年逝世。中共湖南省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笔者注：《右派群体的组成与征貌》是作者自传《幸存者的歌》（暂定名）中的一节，本文是其中的一段。其余段落有：（二）右派分子的地域分布，（三）右派分子的职业分布，（四）右派分子是些什么人？（五）……（六）……等正在写作之中，预计年底脱稿。

“右派”的数字哪个“靠谱”？

木 人

在一份《五七动态》的第 9 期，看到一篇材料，对阎桂勋（我不认识）在网上发表过的文章《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以及其他人的文章中所引用列出的 1957 年反右运动中被划“右派”的数字 300 余万，表示“置疑”，并且一律斥之为“不靠谱”。建议再谈反右数字，都应按 55 万，统一口径。

以愚之见，此建议才叫“不靠谱”。

本来就没谱

反右是 1957 年开始的。不妨从五十多年以来共产党的相关文件和“领导人讲话”谈起。

1957 年 6 月 29 日，中共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说“全国大约有右派 4,000 人左右”。

1957 年 7 月 9 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央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的通知》中说：“准确的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 4,000 人，而是 8,000 人”。

1958 年，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说“全国有右派 300,000 人，把 300,000 右派搞臭了”！

1959 年 9 月，中共中央《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指示》中说“……全国揭发出右派分子约 450,000 人”。

处理完“右派”都已经过了四年，本人也是“右派”，已经在茶淀农场第一批被摘了帽子。1962 年，中共中央发了一个[1962]544 号文件，文件说“……不经过中央和省委批准，不得再划右派”。由此可见全国反“右派”运动实际上是一边揪斗，一边处理，一边给极少数人摘帽，一边继续打“右派”。一直进行了四、五年，真正是乱了套，这四、五年谁知道划了多少“右派”？哪儿有什么劳什子“谱”呢？

1976 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汇编的报告中说“在整个反右运动中，有 2,013,300 余人被定为右派”。

1978 年 9 月，中共中央《关于继续执行中央[1978]55 号文件几个问题的请示》说“右派是 548,111 人”。

1979 年 2 月 17 日，刘澜涛在“改正右派经验交流会”上说：“当时划了右派 540,000 人。”

1979年，中共中央中发[1979]65号文件中说：“……在反右中被定为‘中右分子’及‘反社会主义分子’……其中仅失去公职的就有160,000人，这些人虽未戴右派帽子，但有的所受处分比右派还重，处境困难。”[注：这些在“反右运动”中“处分比右派还重的”当然也是“右派”。仅仅是因为共产党自己乱了套，没有统计其数字的一部分“右派”罢了。]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第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为1957年反右辩护时说：“57、58年的反右派是‘正确的’，‘必要的’……我们反了2,900,000右派。”（台湾新闻周刊沙兹伯里著，林君彦译《新皇朝》第161页）

1993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薄一波著的《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的回顾》才又出现了一个“错划了右派550,000人”的数字。

三十多年中，其他说法都抛开不说，共产党就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也就是“没谱”，不知道为什么那位先生要人专去靠550,000这个“谱”？

根据武宜三先生编的《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不完全统计：

辽宁省凌源县新生焦化厂，300多人的厂，饿死227人。

甘肃省夹边沟3000多人的劳教农场，只有200多人存活。

青海省香日德劳教农场40,000多人，只剩下2,000多人。

北大荒、茶淀农场劳教的右派死了多少？

全国……………

除了这些数字没有被提及，当时还有：中右、右言、未戴帽右、同情右、划不清界限右、莫名其妙就送走等等被处理了的“未列名右派”。这都统计在内了吗？有个准确的“谱”吗？

为什么许多人都相信并使用300多万这个数字？

1985年叶永烈出版了《反右派始末》。书中谈到：“1980年，右派改正工作基本结束，全国的右派有了精确的统计，即550,000多人。当然这仅仅是指‘正宗的’，还不包括‘中右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注：反右后期中央指示不叫右派，改称‘反社会主义分子’]”言外之意是总起来算，绝对不是550,000人。实际上专门研究“反右史”的叶永烈，他占有许多材料，根本就不相信这个数字。只不过他不敢明说。而且许多人也不相信划右550,000人。因为大家被骗多年，已经逐渐明白了。

2006年2月，香港杂志《争鸣》爆料：“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反右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定为右派分子者3,178,470人’。”对此，中共并没有出面否认。当然这最后的数字是靠“谱”的，应该依据的。

根本失去了公信

提建议的先生还要用知识分子总数500万来计算划右数。这确是一道难解的数学题。

中共建政之后，毛泽东就让知识分子像被泼了一瓢冷水在身上的狗一样——夹着尾巴作人。这些被挤兑的知识分子挨整、分化、瓦解……那500万的约摸数早就对不上号了。

再说，知识分子到底以什么为标准？以大学毕业的文化程度为标准吗？谁作过这个统计？反右时，主要挨整的是“知识分子”。但在斗争、处理时，连中专生、中学生、小职员、店员、小贩、修女、民办教师等也划了“右派”，把被划“右派”的人，通通算作知识分子？同时暗定“名堂”的[定什么分子也不好定，就把他们暗中算“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公布，也无法公布，只是把人抓走了]这些人算什么？

反右运动是毛泽东一手策划制造的。他自己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冠马克思是假，超秦始皇是真。他口头上总谈“人民”。实际上他对“人命”是最不以为然的。在建国后所发动的整人运动，从来没有专门的、精确的统计数字。虽然他自己说他数学不好，但整人、杀人他全来“百分数”。都是由他“随意性”地在纸上划拉个百分数，然后就按百分数去整人、杀人。他从井冈山

杀 AB 团开始，就是采用了“杀人立威”的政策。目的就是把人给“镇住”，贯彻“一言堂”。从来就没把“人命”当回事。从建政开始，整的人数次次增加。他大概也知道理亏，事后总在那些数字上编瞎话，骗人。不说真话，隐瞒实数。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他拿五四年新制定的《宪法》搞名堂。在反右后期，从法律的角度说，他面临的情况叫做：“师出无名”。处理“右派”时，冠冕堂皇拿《宪法》出来作幌子，说什么“根据《宪法》第 100 条”，用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的名义，发布了一个《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然后用这一“法规”劳动教养了多少万所谓“右派分子”。

他所依据的五四《宪法》第 100 条，其实当时被他完全篡改了。第 100 条的原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劳动纪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公德。”

其含义被他公然篡改演绎成“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力的人，改造成自食其力的新人；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这些牵强附会的内容可以说和所谓“右派”的行为完全无关。

然后，在中国的《行政诉讼法》中又规定：“对国务院的文件和规定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这就作死了：“想怎么整右派就怎么整右派，怎么整都是不犯法的！”把劳动教养搞成了非法剥夺公民一切合法权利的手段。各地的头头据此乱整“右派”，公报私怨，没划“右派”也能把人送走。这又怎么算？

在这种情况下，他只顾整人，哪管你算不算知识分子？

能随意篡改《宪法》的人拿出来的数字，有多大的可靠性？

毕竟中国有句成语：“做贼心虚”。坏事就不能公开。这恐怕早已成了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潜规则了。对于国人来说，也是尽人皆知的事。

大跃进饿死中国人 3600 万，刘少奇被良知折磨，七千人大会他说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他对毛泽东说：“历史要写上你我的！”结果怎么样？还不是惨死郑州？谁说实话整死谁！

这 3600 万数字折腾了 40 多年了，不是还在真真假假地折腾吗？搞了多少人在编“瞎话”。就是不说真实数字。《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在位时他不敢说，退休之后，他承认确实是饿死 3600 万。

在这种大气候之下，提出一个党的数字叫人作为依据，真搞不懂这位先生是缘起何因

我所认识的“右派” ——纪念反右运动五十五周年

吴兴勇

章诒和女士的《往事并不如烟》一书问世后，成为名著，一时洛阳纸贵，争相传阅，好评如潮。坊间有不少盗版，估计发行量近百万，即使后来当局查禁，也禁不了民间的“章诒和热”。

多年来，因当局对“右派”的丑化、妖魔化，致使“右派分子”在一般群众的心目中是贱民、异类、居心叵测的坏人、思想不纯的顽固派、图谋夺权的野心家……舆论的导向一直在鼓动老百姓蔑视和仇视“右派”，“谎言重复一千次也会成为真理”，就这样，被划为“右派”的人都沦落为人所不齿的撒旦、活该淘汰的劣民。

因而，个别“右派”摘帽后，仍被称为“摘帽右派”，依旧是准“黑五类”，三中全会后，“右派”一风吹，全体摘帽，绝大多数获得改正，定为错划，群众对“右派”的看法好了一些，在他们的心目中，“右派”再不是“臭不可闻”了。但当政的“毛左”们，仍把“右派”看成是有历史问

题的人，是“改正右派”，其身上的“污点”并未消失，只是日深月久，政府不再计较了，姑且赦免其罪，但如犯新罪，则是“有前科”的人，“新账、老账一起算”。自从我被落实政策，进入单位工作后，这样的“左派语言”我听见了很多很多。

章诒和的书出版后，广大读者读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右派”和我们没有区别，都是秉性善良，有人性，有正确的爱憎的公民，他们长期被误解，被丑化，是对他们最大的不公正。

但章诒和所述说的都是最著名的大右派，如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聂绀弩、史良等，还有不是右派的清流：张伯驹、潘素夫妇，康同壁母女等。即使不打成右派，这些人士也早已是名人。章著的风行也与“名人热”有关。

但许多小“右派”却无人立传，他们永远埋没无闻，他们的苦难无人知晓。

我本身是“右派”，故生平接触“右派”甚多，这里要说的是一些小“右派”，这些人被划右后，不少死于迫害。那些能熬过21年非人生活的人，虽后来生活有了一点保障，但心理受到创伤太深，激愤难平，日子过得并不愉快，经济条件仍较差，许多人在宽松的环境下活不了多少年就辞世了，只有极少数活到今天，而且随着国家经济的上升，生活有所改善。

我是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被划为“右派”的，当时我只是一个低年级的大学生，爱独立思考，对当前的政治和制度持批判态度，受我的思想影响划为“右派”的有周济旺、刘法生两位同学。

周济旺同学为人厚道，朴实无华，特别可贵的是在高压面前不屈服，显得十分刚强，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拒绝在各种认罪的文件上签名，抵制到底，结果和我一样，被开除学籍，劳动教养，到达劳教地点三水农场不久，他就逃跑了，不幸被抓回，判刑十二年。可他在清远劳改所再次逃跑，又被抓回加刑至20年，送往青海改造，此后他改变了斗争策略，由一再逃跑转变为一再申诉，最后终获减刑至3年。刑满留在青海劳改单位就业后，他争取做办劳改报纸和赶马车运输生活物品等既轻松又有额外收入的工作。毛泽东死后，“四人帮”倒了，他立即离开青海，跑回中山大学，在那里坐待落实政策，中大不得不给他提供食宿，终于被安排在湖南岳阳地区临湘县四中教书，至今仍健在，他的顽强不屈的精神令我钦佩。

另一个刘法生同学，很有头脑，思想敏锐，好学多闻，虽出身贫寒，但是个抱负不凡、眼光远大、挺有才气的青年，特别是他待人平和厚道，真诚不二，十分难得。我最初见他像乡下人，缺乏风度，有点轻视他，避免和他往来，但他一点也不计较，主动找我结交，我们终于成为知心朋友，无所不谈，见解一致，也可以说，他被我感化也成为批判现实的人。他没有写大字报，也没有露骨的“右派言论”，班上将他打成“右派”，完全是为了凑数。学校对他的处理很轻，留校察看。我和周济旺被送劳教后，他是唯一给我们来信的同学，他在信上说：“宿舍前面贴出大字报，说什么‘歇斯底里地叫嚣向波兰学习的右派分子吴兴勇滚蛋了’，我才知道你们交了恶运，惊诧之余，不免‘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这封信是我和刘法生的最后的交往，80年代，“右派”普遍“改正”后，我听说纯朴真诚的刘法生同学已不在人世。他受的处分最轻，却落得最坏的结局，令人不禁想起老子的“祸福相倚”的格言。从他的同乡周济旺的口中，我大略知道了他后来的遭遇：大学毕业后，他和同级的五个同学分配到河南，其他的同学都分配在郑州等富庶之地，唯独他被分在极偏僻的地方教中学，这也可以说是对“右派”的一种惩罚吧。适逢大饥荒时期，当地生活极苦，出生在鱼米之乡的他决定辞职回乡。据我看，他辞职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忍受不了政治上的歧视和高压。他辞职后在湖北武汉等地办学，收徒教授，文革中被清洗回家，受公社管制，他不堪重压，写下追求自由歌颂人性的诗篇，当众朗诵，被诬为“反革命”，由民兵抓到公社整治，他恪守圣贤“威武不能屈”的格言，坚持士人应有的气节，竟死于民兵的拳脚之下，其遗体被送县公安局，当做“现行”结案。就这样，一个有

才能有知识的学人含冤去世。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并没有死，他像古代的大诗人屈原那样，其身影依旧在洞庭湖畔、三湘楚地游荡，一面吟咏他的爱好自由的诗篇。

除了周济旺和刘法生外，我对其他的在中山大学里被划成“右派”的同学也记忆犹新，多年来我的脑海里不时呈现出他们的面容，他们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优点和特长，他们获得改正后，都将余生无私地奉献给社会，在各自的岗位上创造出优异的业绩。他们是：

历史系一年级的周中坚、蔡全照、卢咏尧、汪剑鸣、李宗武、何徵清、蒋炳光；

二年级的姚敬恒、程万里、宾奚赞；

四年级的汪廷奎；

西语系的孙中仁、杨宗琨、丁明浩、唐同学、梁同学、李同学；

化学系的钟炎吾；

物理系的冯启礼；

中文系的姚龙波等。

周中坚性格沉稳，是儒家“温良恭俭让”的代表，对学术痴迷。新时期在广西社科院负责东南亚的研究，学有所成。

汪剑鸣笃信社会主义，思想正统，文革中，红卫兵要他挂“右派”牌子，他坚决抵抗，表现了“士可杀不可辱”的气概，因此被捕判刑八年。平反出狱后在吉首大学任教授，著有《法国文学史》。

蒋炳光原为班长，反右后期被补划，回到广西，文革中躲过杀人浩劫，新时期任广西桂林地区高中校长，业绩突出，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汪廷奎“改正”后进入广东省社科院，以副研究员退休后，退而不休，主编了《广东通史》第一卷，参与编辑《林则徐全集》，参与校点《袁世凯全集》，并自费出版《中国帝王文化》一书。

孙中仁在反右运动中，敢于和监管他的同学打斗，被送劳动教养，在劳教中曾逃跑过，后被送往青海，“改正”后在长沙保险学院教英语，兼管外事工作。

姚龙波“改正”后任湖南邵阳县教师进修学校的校长。

姚敬恒一直任教贵州大学。

其他“右派”同学后来的遭遇不清楚。可惜的是，何徵清同学文革中未逃过杀人浩劫，李宗武同学在青海丧生，不然的话，他们的才能在新时期一定会发光发热。

程万里同学是江西人，转业军人，社交能力很强，获劳教处分，在三水农场一直担任大组长，积极替管教干部效劳，自己也得点好处。

钟炎吾同学是广东人，劳教时在农场里担任小组长，他曾很难过地向我诉说：他动手打过他管辖的劳教人员，事后很后悔。

宾奚赞在全国一片声讨“右派”的形势中，飞蛾扑火，冒险贴大字报，讲述自己的世界观，其中无一字涉及政治，仍被加罪“含沙射影”，划为“右派”。他嗜书如命，有一次他在书店里拿了几本书，没有付钱，因而罪上加罪，被学校开除，我在三水农场曾遇见过他。

我班刘宜安同学被划为“中右分子”，他是干部生，比我年长，但我们谈话很投机，天南海北，无所不谈，是思想上的朋友。反右后他仍跟我往来不断，毫无轻视我之意，他如果积极检举揭发我的问题，将我的言论全部向党支部反映上报，也许他能脱掉自己的中右帽子，但他没有这样做。改革开放后，他才将我的部分谈话向党内人士述说，并且是从正面意义上说的，没有伤害、贬低我的意图。刘宜安同学纯朴坦荡，是个性情中人，怀才不遇，一生未婚，没活到退休年龄就逝世了，同学们打算出版他的文集，未果。

西语系的梁同学被打成“右派”更是天大的冤枉，某天，他上台批判已被定为“右派”的唐同学，说：“唐同学曾参加志愿军，为保家卫国，浴血沙场，打击美帝，为什么是右派呢？”本来他的发言尚有下文：“由于唐同学忽视思想改造，骄傲自满，所以才堕落为右派……”可是主持会议

的高世同不让他说下去，立即给他加上“替右派辩护”的罪名，凭一句未说完的话划为“右派”。后来负责处理“右派”学生的工作人员也知他太冤枉，毕业后将他留在学校中当资料员，每月工资三十元，直到“右派”改正后才恢复教工身份，发给大学毕业后应有的工资。

据我所记忆，在中大历史系任教的老师中，划为“右派”的有林楚君、曾纪经、罗应荣、罗木公等人。其中——

林楚君教授是政治学教研室的主管人，精通《资本论》，教我们这一年级的政治经济学，据说他曾做过策反国军的地下工作，被国民党政府不断追捕。他颇有风度，单身贵族，至今我还记得他牵着独生女儿林丽琼在餐厅吃饭的身影。他因鸣放时说“党委制是三害温床”而被划右，1959年摘帽后在暨南大学教政治经济学，1985年离休，次年就逝世了，没过几年轻松日子。

罗木公老师因“右派”问题被开除送三水农场劳教，下落不明。

听说罗应荣老师也因“右派”问题于文革时累死于三水农场。

曾纪经教授给我们上“中国历史文选”课，在学生鸣放的那几天，他在上课前说了几句话：“同学们响应政府号召，参加鸣放，很好。我年轻时，在中大读书，也贴过教务长郭沫若先生的大字报。”说完，同学们一阵鼓掌。这几句“多余的话”使他终身背上了“右派”的罪名，人生的最后年月很凄凉，每天读《庄子》自慰。他死于“改正”前。他朱笔批注的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最近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售价1500元。说明他的思想成果至今还在给社会做贡献。

中文系的教师中有一个右派集团，包括董每戡、叶启芳、詹安泰和吴重翰四位教授。因四人有一次聚在一起吃蛇宴，就加以“小集团”罪。我在学校里见过丑化他们的漫画。

董每戡教授有东南戏剧家的美誉，30年代在上海属于左翼作家。在一次鸣放会上，陶铸称赞他发表在《文汇报》上的诗：“书生自有嶙峋骨，最重交情最厌官。”他受到激励，因而发表“两副面孔说”，被划为“右派”。他后来辞职回长沙，生命的最后20年十分潦倒，活到73岁时，才蒙“改正”，不久就逝世（1980年）。1999年广东出版了《董每戡文集》三卷，2011年岳麓书社出版了《董每戡五卷集》。生前虽极不幸，生后尚有荣名。

叶启芳教授教外国文学，最先将洛克的《政府论》翻译成中文，该译本于1964年由商务出版，1982年、1996年不断再版。他被划“右派”时已有75岁，是全校年纪最大的“右派”。反右后一度还上讲台授课，可学生已不对他起立致敬了，一些左派学生还写诗讽刺他。我曾亲眼见到那首贴在教室里的歪诗：“右派分子叶启芳，专背讲义读文章……”

我被送往三水农场劳教后，在那儿见过一些名流，如广东的胡风分子、诗人朱谷怀和名作家“右派”魏中天等。

朱谷怀1922年生，194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当时约40岁，在劳动中不失诗人风度，能歌善唱，每天读报，他曾和我编在一个组，他有正义感，见我年少被欺，在小组会上仗义执言，称赞我积极劳动。他可能直到文革结束才释放，1992年谢世。

魏中天毕业于黄埔六期，抗日期间挂少将衔，早年曾给鲁迅创办的《语丝》投稿，著有《我的母亲》等书。我见到他时，他约五十岁，当时我任副组长，魏是我管的组员。他为人乐观稳重，笑脸常开，每月有香港来人给他送食品，在劳教队中过着“贵族”生活，身体依然很胖。文革结束才获解放。新时期听说他任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香港中国文化馆馆长，2010年3月去世，享年103岁。

在那儿和我一起劳动的还有广州市领导干部中的“右派”杜崑和林洽等。杜崑有20年党龄，东北人，个子高大魁梧，气派非凡，看来原来官职不小，开始任大组长，但因属下一个小组长乔鹏程逃跑，被撤职，还送集训队惩治，但终究因是老革命，后来提前结束劳教，回单位去了。

林洽为人和蔼，说话轻言细语，十分同情和关心我们这些涉世不深、难以适应的大学生右派，鼓励我们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农场中，他待我亲密如兄长，指点如导师，我解除劳教回湖南后，他仍来信指点我。四年非常艰苦的劳教生涯，如果没有林洽这样的难友的帮助和鼓励，我很难捱过。我和林洽后来断了联系，不知他离开农场后的境况如何。

在三水农场劳教的“右派”我能记得名字的还有司徒友新、王恬、周天、王善伦（后三人来自汕头）等人。

我离开三水农场回到家乡湖南省邵阳市后，知道我父亲的朋友曾昭智、贺涤心等，我中学时代的教师容众、刘一稣、陈新宪等都被划成了“右派”。

曾昭智是医生，邵阳市农工民主党主委，因1949年以前任过邵阳公医院院长，被当做历史问题，划右后判刑十余年，很快病死狱中。

贺涤心是我家的邻居，任邵阳六中校长，大音乐家贺绿汀是他的亲弟弟，他一家都是有知识的人，其中被划为“右派”不少，被讥讽为“右派家庭”。

容众老师思想激烈，是不甘寂寞的人，鸣放时出语惊人，“改正”后任邵阳市政协主席。

刘一稣教过我的语文，思想左倾，最初说我的作文好，后来又说我的作文有思想问题，反右后期他也被充数划为“右派”，幸运的是，他虽有肺病，但享寿很长。

陈新宪是闻一多的学生，有文学才情，因家庭出身等问题，划右难免，未活到“改正”就死去，死后家属想开个追悼会都被禁止。陈老师儿子陈达人新时期任市地志办副主任，是我的好友。

令我长叹息的是，我高中时代的同学郭仁也被打成了“右派”。郭仁一生很不幸，做人低调，是个悲观主义者。他负有天生的“原罪”，1949年他的父亲和长兄去了台湾，造成他的家庭“社会关系”问题。为了洗涤原罪，他一生作了最大的努力，但收效甚微。1950年他放弃学业，和二哥郭志一道参军，在朝鲜前线三年，任卫生员，救死扶伤，自己也得了耳聋等战地病。但未受重用，回国后就被复员。他立志继续读书，考入邵阳一中高中班，1956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该年大学大量扩招，政审也宽松，以他的成绩考上一个重点大学应该不成问题，可全班同学几乎都上了大学，唯独他因没有通过政审而未被大学录取。他二哥复员后当一名基建工，日子过得平淡而较安定。他因多读了几年书，能进入民办中学教书，不想反而惹祸，1958年反右补课，即使他努力表现，仍不免被划为“右派”，开除教席，在社区待业。他一直小心翼翼，争取摘帽，但总不能如愿。文革一开始，就和老母一起被戴高帽游街，1968年又因翻案关押近半年，最后同老母一起被遣送到最贫苦的绥宁农村。“改正”后在一个郊区中学教书，已垂垂老矣。几乎终身未婚，七十余岁病逝。郭仁和我既是同学，又是终身难友，待我如兄长，十分关心。他对我这同学难友，颇有侠义胸怀，每次我遭难，他总来安慰鼓励我，我交了好运，他就回避我，不愿沾光，从而体现出平凡中的伟大和布衣贵族的精神。他属于白先勇笔下的“最后的贵族”（先朝遗民）一类。

我因“右派”问题，滞留邵阳近二十年，其间结识了好多“右派”，令我难忘的有韦执中、王浩等人。

韦执中是人中之龙，原是会计科科长，划右后流落社会，有惊人的逆境生存能力，以承包工程见长。多次被工商部门追查和关押，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总能化险为夷，我常在他手下作工，他见我是难友，也另眼相看。文革中，他妻子因出身和社会关系问题被关押致死。他独力养活儿子、女儿和女婿，仍保持着体面的生活。但1978年摘帽、安排工作后，上班才半月，就病倒在床，不久被病魔夺去生命。难友们都替他惋惜，凭他的经济才干，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必定大有作为也。

王浩原是中学教师，划右后开除，老婆离婚，因他在国军服务过，定为“历史反革命”，在城市拖板车，我和他同住一条街，交往较多。他仍保留着国军军官气派，处理事务有气魄，从不苟且，但心地善良，待我很好。文革中他被遣送到最贫苦的绥宁农村，不堪迫害，自杀而死。改革开放后我见过他儿子，问他有没有替他父亲申诉，他儿子不愿再提往事，因为这使他太痛苦。

我家的近亲中至少有九人划为“右派”，他们是：表姐邓宏进（邵阳市人民医院护士），表哥邓宏逊（邵阳市人民医院放射科技师）、表哥魏铿（湖南省新化县中学教师，“改正”后离休）、表哥魏杰（湖南衡阳铁路工程学校教师）、表侄邓慕飞（邵阳市立医院放射科技师）、表哥李敦文（湖南省新化县川石小学教师）、表姐夫朱在贵（新化县税务局干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嫂子范寿芬（贵阳荣军学校教师）、姐夫董仲芳（邵阳回族子弟学校教师）等，除表姐邓宏进在1968年自杀外，其余都活到了“改正”的那一天，并且有三人今天还健在。此外还有姐姐吴兴恕（邵阳市小学教师）划为中右。

表姐邓宏进一生是悲剧。她出身地主家庭，经家庭包办和我哥哥结婚，这种包办的表亲婚姻本来就不幸福，1950年，她见地主家庭没落，投河自杀，船夫将其救起，将奄奄一息的她丢弃在岸边，邻居刘士奎先生将其背回家，极力抢救，使她从死亡边缘上活了过来。我父亲将他介绍到邵阳市人民医院工作，她从头学习护士工作，同时学习政治，决心与地主家庭“划清界限”，登报和我哥哥离婚。可不幸仍降临，因她的地主血统，1957年她被划为“右派”，送往邵东一农场劳动，她在那儿给劳动的“右派”们治疗疾病，表现很好，1962年摘掉“右派”帽子，回医院工作，经人介绍和长沙一名“右派”作家黄希玲结婚。但好景不常，文革一来，作为“摘帽右派”，又被剪掉头发游街。后来她靠拢医院里的“揪黑线”造反组织，请其帮她平反，因此，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被拉出来狠狠批斗，要定她为地主分子，当晚，她在单人宿舍中写下“我不是地主分子”几个字，上吊自杀，以死明志。这次自杀再没有人救她了。医院以“畏罪自杀”结案。她第一次自杀时救活她的那个邻居刘士奎先生后来也被划为“右派”，在1970年前后自杀。

综观以上中、小“右派”的不幸遭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如果划右时年富力强，或有非凡的应变生活能力，也许可以熬过那受非人待遇的21年，年纪老大者、无应变能力的书生、生性悲观者很难熬过。

二、如有亲人在身旁，特别是像《天云山传奇》电影中一样，有一个忠心的配偶相伴，也许可以度过那21年危难，单身生活者较难度过。

三、富庶的地区的“右派”在改造中死得较少，家庭环境较富裕者容易熬过这21年。

四、如命运作弄，落在某红色恐怖的中心（如湖南道县及附近若干县，广西宾阳县及附近若干县，北京市及郊区大兴县等地），则十分危险，在其他地区，危险性较小，也许可逃过劫难。

五、即使在劳教、劳改单位，单纯干体力活者易累死、饿死，如果能干技术工，当医生、食堂工，办劳改报，担任大小组长，则或许不致于累死、饿死。

六、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情节较轻留在单位里或社会上的“右派”很孤立，无人保护，自杀或死于群众专政的可能性较大，情节重的被判刑劳改、劳教，生活在同类的犯人当中，受一定的法规保护，或许不致于死。

“红歌”记忆及其他

黄晓龙

我们这一代人几乎都是在“红歌”（即“革命歌曲”）声中由少年、青年、而中年、老年的，一生命运的所有起伏跌宕，都在红歌声中演绎和嬗变。以致每听到那些熟悉的，与记忆纠结于一体的旋律，就有一段尘封记忆被唤醒。

对于我们这一代，红歌不仅是一道道刻骨铭心的记忆符号，不仅是个人、家庭，地域、族群，乃至国家民族命运的见证，甚至是我们这一代命运的编年史。更重要的是，正如我们最初的价值判断与人生追求曾经来自红歌一样；我们的觉醒和思考，也同样始于红歌；始于红歌声下所经历的灾难；始于红歌主题和价值指向与生活真实的完全相悖，始于对荒诞和虚伪的省悟及思考。

我敢说，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及其个体的命运，与一种艺术形式有过如此紧密、直接的关联。

一、红歌为梦想插上翅膀

说来很少有人相信，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我，早在四五岁时就听会了好几首“红歌”。那时，父亲系江北私立正本中学校长，母亲随父亲在校教音乐。在那段童年记忆里，每天都有《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山那边呀好地方》的旋律，伴着母亲的脚踏风琴声，在学校的教室花径曲廊和操场上回荡。由于混沌未开，除了对幼稚园里“功课完毕，要回家去，先生、同学，明天再见……”的歌声有朦胧意会外。诸如“法西斯”、“解放区”、“灯塔”，甚至“一片稻田黄又黄”一概是稀里糊涂不知所云。

但那些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明丽清新且又生气勃勃的旋律，却如阳光、清风般为童稚的梦幻插上翅膀。在好奇中，让我几乎一字不差地记住了每一个乐段，每一句歌词。

中共建国初期，重庆江北城有一支“民众合唱团”，每天下午都在治平中学礼堂练歌。除了《东方红》，全是《国际歌》、《喀秋莎》、《共青团员之歌》、《乌克兰民歌》、《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之类的外国“红歌”。尽管对其含义依然恍里惚兮，不知所云，但那些极富异国情调、雄浑流畅、昂扬奋进的旋律，却有一种直接渗入人心的力量。

尽管那时，父亲已经被正本中学所在农会，以配合减租退押清理校产的名义带走，而后又以“特嫌”罪名被关进江北县看守所，且一关就是两年多。就在以“特嫌罪”被判刑三年的判决下达前夕，狱中伤寒流行，染病仅几天的父亲亦病逝狱中。幸运的是，经当时任职于市军管会的治平校友斡旋，母亲谋得一小学教职，但靠母亲的微薄薪金维持一家六口生计，其清贫如水的困顿处境至今犹历历在目。但即便如此，在那段长达五、六年的童年记忆里，却仿佛无时不飞翔着歌声与梦想：每天都被广播中《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莫斯科——北京》、《川江号子》、《卡林卡》、《红莓花儿开》、《山楂树》、《深深的海洋》、《敖包相会》、《好久没到这方来》这类歌声唤醒。在联翩浮想中，每一天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尽管按后来的标准，那些不少歌曲都难称之为“红歌”，但我敢说，与时下这些即使饰满华丽的装饰音、丰富的和声背景与伴奏交响，却始终难以掩饰其思想的苍白和感情虚骄的“主旋律”相比，无论就审美层次，就艺术感染力而言，当代红歌绝对难望其项背。至少，那些鲜有矫揉造作，几乎每一段乐句都激荡着至真至纯的热诚与渴望，是当代红歌永远都难以企及的。

也正因如此，即使在对当今的红歌充满了质疑和不屑的今天。那些承载着源远流长的人类梦想的旋律，始终令人难以拒绝忘怀。每听到它们，就会有一种久违的亲切和温暖。那些理想主义的光华，那些朴实真诚的情感，那种如情似梦般质朴飘逸的美，那种浪漫、忧郁和悲悯中的高贵，对混沌初开的少年，都是永远令人神往的境界。

二、灾难在红歌声中开始

是红歌开启了我们对于红色未来的梦想和渴望，也是在红歌之下，在对红色未来的渴望与向往中，一扇又一扇灾难之门被相继开启。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人民江山坐得牢，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褪尽了梦幻般的温柔和诗情画意，远离了此前的阳光开朗。浪漫舒缓的节奏变成了快板书的平庸，载着强词夺理的蛮横、仇恨与凶狠，以幸灾乐祸落井下石的下流快意，在每天数遍的重复下，以高频率高分贝的强势，一举成为一场又一场接踵而至的灾难的前奏。

直到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只要一听到那支歌，就会油然想起自1957年秋季开学始，持续了整整一学期的羞辱歧视。想起那些因学问人品而倍受敬重的老师，突然从讲坛上销声匿迹的恐怖和神秘……

那场历时三年，令数千万人成为饿殍的大饥谨，岂止始于大跃进的狂热！早在理性和良知被集体噤声，势利、奴性和构陷被奉为时尚的1957年，中国这趟列车就已经高速驶上了奔向灾难的轨道。

我的继父似乎对此早有预感。他出身实业世家（前裕华纱厂就是其家族产业），曾就读于北大，抗战时一度担任过国军某师政训处少将处长的继父，1957年正在重庆市第十六中学任地理教师，加入民盟仅数月，就成为“右派”，而后又新账老账一起算，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刑8年，直到1975年全国特赦原国民党“军警宪特”时方才回到重庆。

那是1957年底一个寒冷的星期六下午，我随继父从江北嘴渡河回到暂居于凯旋路中学的母亲宿舍，在道门口偶遇一群在冷雨寒风中瑟缩不已的乞丐，不禁戚然驻足。稍顷，他就扯我的衣角，摇头低语：“小龙，莫看了，要不了几年大家都会饿成叫花子，到时候，就是想要饭都要不到了……”随即甩下我，一脸黯然地低头疾走。追上他，我颇为不解地追问：“不是合作化了吗？粮食不是一直在增产吗？未必还会饿饭？”“唉，你不懂，过几年你就晓得了。”

果然，在1959年“十年大庆”后的秋风萧瑟下，当我和我的同学们个个都在饥肠辘辘中瑟缩不已，一听到学校收音机里响起辉煌磅礴，高潮迭起的《祖国颂》；就想起被继父的预言。

大跃进开始的1958年春，刚转学到母亲执教的四十中。歧视和迫害戛然终止，少年的天空又是一片开阔蔚蓝。紧接着，苏联卫星上天，举国为之狂欢。在一派超英赶美的汹汹豪情和急不可待中，市中区的几条主要大街，几乎每天都有盛大的报喜和庆祝游行。每次游行，都有我以前在江北极难见到的铜管乐队一路高奏“苏联卫星高飞在天空，和平宣言深入人人心中……看东风压倒西风”和“五年计划看三年，苦战三年看头年，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的旋律为之壮行。那浑厚雄劲的低音号，每一声都猛烈地撞击着少年人心中那根躁动的弦，令人不能自持。

“大灾之后必有大疫”，在理性和良知的废墟上，谎言和盲目高热的病毒就呈几何级数增殖。

那时，学校每周都有两三次义务劳动，我们这些体重不过七八十斤，明显营养不良的少年，尽管不堪重负，但抬水泥，背150斤一包的麻袋米包，担焦炭，下农村修水库，挖红薯……无不个个争先。在“鸡窝炉”和“浸钢炉”前，凡是男同学，几乎每个人都有过几昼夜挥汗如雨“不下火线”的壮举——将铁门栓、铁锅、火钳、锅铲投进炉膛，待烧红后，再用长柄抱钳挟起，在药水里一浸，“呲”地一声，一阵蒸汽弥漫，“钢”就这样炼成了。

同班好友刘祖培，手风琴已拉得炉火纯青，从他轻盈跳跃于琴键上的指尖，张合有致的风箱里流出的《多瑙河之波》和《杜鹃圆舞曲》、《马刀舞曲》、《霍拉舞曲》、《骑兵进行曲》，倾倒了所有的同学。由他作曲，我作词，我们创作了好几首诸如《美丽的山城》、《金色的五月》、《人民公社好》之类歌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歌，经常在学校或街头演唱。以致在九十年代的某次同学会上，有同学无意间唱起那几首歌时，令我羞惭得耳朵发烧满脸通红，既为当年的愚昧和虚荣愧疚不已。也为赤诚和纯真被愚弄而满怀痛惜愤怒。

其实，就在那个狂热得不知常识为何物的年代，周围也有不少成年人是清醒的。就在我一连几昼夜守候在“浸钢炉”前“苦战”那些天，班主任杨福国就曾几次委婉地劝过我：“你还年青，累垮了不划算。”而母亲则更直接尖刻，每次见我参加“会战”夜不归家，都要讥讽我“劳而无功”、“庸人自扰”、“自作多情”，说“无论你怎么表现，都改变不了你的剥削阶级出身”。并为我饭量大增，令全家的粮食定量难于支撑到月底忧心不已：“照这样吃下去，不饿饭才怪了”，“哼，亩产10万斤，一个平方该有多少？就是一百五十斤。谷子平铺起来起码有七八寸高吧？哪个信？”“莫说是亩产几万斤，只要有一千斤，粮食就不会定量，就不会每个月只有四两油，一斤肉！”

当然，这都只能是“阴暗角落”里的窃窃私议和牢骚。“阳谋”的余悸尚在，哪个敢“跳出来”重蹈覆辙？

而当时早已在虚妄狂热的红歌中不知东南西北何在的我，却始终对这类清醒的声音嗤之以鼻，那怕是来自母亲。

而生来就从不会“务虚”，不知“革命浪漫主义”为何物的农民却不尽然：同班好友黄珏那时曾对我讲过，他家当时来了一位农村亲戚，一问起人民公社，高产“卫星”，“敞开肚皮吃饭”，就含血喷天大骂狗屁。以致一向温文尔雅的他，对这个长他两辈的农村亲戚，也大为不敬地称其“反动”“自私”。

至今我始终怀疑，那首所谓“新民歌”“我就是龙王，我就是玉皇，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是否真出自农民之手。极有可能，和此后的很多豪言壮语一样，都是某些怀才不遇的秀才趋时逢迎之作。

二十多年后的八十年代，我曾问过好几个当时曾经在“打擂台”中脱颖而出的大队干部，是否真相信自己在一天内将三分地深翻一米，那可是200个立方，是一台中型挖掘机一个台班的工作量！他们的回答都惊人相似：“其实哪个都心知肚明，都在捏倒鼻子哄眼睛。”有人还反诘：“就是我不去‘打擂’，别人也会去‘放卫星’，说不定虚劲比我还提得凶。”

那一轮红歌潮，不仅湮没了常识和理性，更有从历次政治运动中侥幸残存下来的诚实品性和常识良知。有人是因为恐怖而言不由衷，有人是因为眼前伸手可及的好处和利益而满嘴跑马。所谓“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就在大跃进歌声震耳欲聋之际，残酷的、要命的、每个人每天都必须面对的饥饿就悄然降临。

三、辉煌之下的灰暗绝望

《洪湖赤卫队》的作曲家肯定不会想到，堪称中国歌剧最成功的幕前曲《洪湖水浪打浪》，会在很多人心目中，成为那场饥饿最鲜活残酷的记忆符号。

正因为它朝露霞光般的华彩，与备受饥饿折磨的绝望现实间的强烈反差，作为饥饿记忆符号的地位，才难以动摇。

1960年元旦前夕，重庆市话剧团在长寿湖渔场俱乐部（当时的水产校和长寿湖渔场都在狮子滩，学校党支部亦归渔场党委领导）举行慰问演出。当两个女演员以朝露般瑰丽圆润、华彩四溢的和声唱到“啊——遍地野鸭和菱藕，秋收满阪稻谷香，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时，我突然眼前一黑，金星乱舞，身体仿佛一下变轻变空，恍若在晕眩中飘了起来。好不容易勉力稳住似已不属自己的四肢，举目四望：惨白的日光灯下，清一色面呈菜色，瘦如骷髅的脸上，全是一双双饥火燃烧的眼睛。

那一刻，由旋律虚拟的丰美华丽，与饥饿绝望的黑暗体验之间，反差如此强烈，强烈得荒唐诡异，强烈得刻骨铭心。

直到相隔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只要一听到《洪湖水浪打浪》，马上就会想起狮子滩那阴晦难明的天空，那几无间断的冷雨凄风。想起每到上午第三节课就饿得手脚冰凉心慌意乱，不得不借偷看小说以分散饥饿折磨的尴尬和苦恼。想起校门外的公路上，像慢镜头般缓缓倒地，而后断气的路人。想起那些面目浮肿，眼神黯淡绝望，或三三两两，或偶偶独行的农场“右派”和“历反”……

也就在那时，迫于饥饿、水肿和死亡的压力，自1957年开始绷紧的思想文化管制，一度有过一段短暂的松动。当那些优美动人，仿佛来自另一世界的抒情歌曲重回生活现实，平庸虚骄的红歌们立刻就相形见绌。

记得1963年春节，趁家中无人，在母亲用于音乐欣赏课教材的一叠唱片里，找到了几张由魏启贤、刘淑芳、周小燕，还有上海音乐学院一个女中音灌制的唱片。正当我听得如醉如痴时，一直令我们全家对其敬重有加的袁廷锴老师来访，他自30年代起就在治平任音乐教师，曾经组织发起江北民众合唱团，于1957年反右前夕愤然辞职，以制作小提琴维生。应他的要求，放完刘淑芳的《宝贝》、《梭罗河》，魏启贤领唱的《星星索》和《哎哟，妈妈》，周小燕的《夜莺》，还有一个女中音的《鸽子》、《西波涅》后，袁老师激动得在房间里打转，连声击节赞叹：“这才是音乐！这才是真正的音乐！”他说：“和这些歌比，《社会主义好》、《戴花要戴大红花》之类，只能算‘莲花落’（一种四川曲艺），绝对登不了大雅之堂！”

四、恐惧之下的神圣与俚俗

文革的酝酿和发生，是在由《学习雷锋好榜样》、《我们走在大路上》之类的红歌营造出的不断升温的“革命化”狂热中开始的。尽管饥馑菜色还没有从人们脸上褪尽。那种已经非常熟悉的，风声鹤唳杯弓蛇影般的紧张不祥，就在歌声里步步逼近。

和前几轮红歌潮不同，被红歌煽起的狂热一旦升温到某阈值，不仅令不谙世事的少年学生变成了丧失常识和理性的群氓暴徒，连红歌自身也被自己煽起的野火烧得焦头烂额。比如《马儿啊，你慢些走》，本是无视民生疾苦的粉饰现实之作，却被宣判为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毒草。比如因电影《上甘岭》走红的《我的祖国》，因为领唱有些嗲声嗲气，颇近似于当年上海滩的流行曲，就被定性为靡靡之音或黄色小调。除了对毛泽东个人的感恩、崇拜、神化和誓死忠于外，几乎所有题材的红歌，都因各式各样匪夷所思的罪名，变为了“封、资、修毒草”。以至文革前夕，泱泱六亿人的中国，只剩下《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东方红》之类寥寥几首。

当年，乌木渔场有两个曾数次在省地两级文艺汇演中为大竹县争得荣誉，足以称得歌唱家水平的知青。在他和她的影响带动下，水库、工地、宿舍，休息或上班，红歌不绝于耳。开初是大好形势下莺歌燕舞的《克拉玛依之歌》、《乌苏里船歌》、《走上高高的兴安岭》、《马儿啊你慢些走》、《草原之夜》，而后渐次变为《枪听我的话，我听党的话》、《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为伟大祖国站岗》、《唱支山歌给党听》、《沁园春·雪》……演进到文革初期，则只剩下了旋律僵硬，犹如诵经的《大海航行靠舵手》，和花里糊梢咿呀呀近似色情小调的《社员都是向阳花》。

就在红歌题材的微妙渐变化中，社教“二十三条”发布，工作组进场，稍后又是516通知。在“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恐怖肃杀下，向来自成一统的渔场，一夜间就变成人人自危，风声鹤唳，过了今天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的炼狱。

就在毛泽东接见首都红卫兵纪录片的主题曲“最响亮的歌是东方红，最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响彻云霄之际。每隔三差五，渔场就有某某在重庆的家被抄的窃窃私议不脛而走。犹如暴风雨前预告着灾难和不祥的风声，令每一个人无不心怀忐忑。

由工作组发动起来的大字报一浪高过一浪，批判揭露的锋芒所指，一个个倒霉蛋无不惊恐变色。我由于出身和长寿湖的经历本就不堪，加之行事高调不屑看人脸色，不时公开顶撞领导，被视为长有反骨，自然首当其冲。

很快，在人工繁殖和鱼苗培育告一段落的当年8月，我再度被发配上山烧石灰。每天上山120斤煤炭，下山170斤石灰，来回36里山路加12里水路。夏秋短裤、赤膊、草鞋。冬天长满虱子、到处破洞补丁的棉绒内衣加一件开花棉袄，依旧赤脚草鞋。没有星期天，无论雨雪天晴，劳动量大，生活之艰苦，绝对数倍于当代农民工。但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咬咬牙都能熬过去。最恐怖最难熬，令人夜夜噩梦的是：运动结束时，等待我们将是何种罪名，属何种性质？

在那段忐忑悲愤，犹如待决囚犯，不敢再相信谁，三个人以上决不敢多说一句话的恐怖绝望下，唯一的放松，是就着难得一见的太阳或篝火，脱光衣裳一边呲虱子，一边或者扯开喉咙，或者咬牙切齿低声怒吼唱红歌。

几十年了，那段记忆依然犹在眼前，1966年深秋一个下午的狮子峰下，难得一见的太阳暖烘烘地照在石灰窑前，刚出窑的石灰和窑膛散发出炙人的热浪，趁等待石灰窑冷却后才能装窑，七八个待决的准“牛鬼”都脱成赤膊，一边翻捡着汗臭熏人的棉衣和内衣找虱子，一边惬意地哼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叭”一声，呲死一个虱子，“万物生长靠太阳”——叭，两个大手指甲间又是一次污血四溅。还有人唱的是“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叭”——“党的话”——“叭”“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叭”在一次次污血四溅中，是阵阵隐隐的发泄快意。

那一刻，红歌不过就是下意识里的俚俗小调，是灰暗绝望中聊胜于无的生活调料。与东北土匪中流行的“说起那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几无二致。和信仰追求之类绝无关联。

今天说起文革，都将其称为浩劫、灾难，但在当时，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突然变成“炮打司令部”，当“老子反动儿混蛋”变成“远飞的大雁”，变成“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时，除了那些血统高贵、陶醉于挥舞皮鞭抄家的“自来红”们，除了那些以为通过整人又可以官升一级的人们外，可以肯定，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突然远离恐惧，获得解放的轻松庆幸和狂喜。

记得“造反有理”一开始，此前手握重权，一脸神圣加神秘的工作组，就不声不响溜之大吉。我们这批“准牛鬼”所有的罪名，在一夜间就都变成了刘邓路线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证和“黑材料”。就像临刑前天恩下达，重获自由一样，将毛泽东视为救星，将他的“路线”视为改变世道、实现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的唯一希望，亦就顺理成章。

于是，壮怀激烈义无反顾地一脚踏进“造反有理”的陷阱，随之又挣扎于“走狗烹”的黑暗绝望，就是注定的劫难。

在文革流行的众多红歌里，最令我锥心刺骨难以忘怀的，是毛接见红卫兵纪录片里的“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当其响彻在每天的广播中不久，突然接到母亲的一封信和一张近照，信上莫名其妙地写道：“妈妈对不起你，……我会努力在运动中改造自己，争取彻底脱胎换骨，”“你是家中的长子，以后一定要照顾好几个兄弟姊妹”……令我颇多不祥之感，一连十多天都莫名其妙地从噩梦中惊醒。直到1967年春节前夕回家，才得知因不堪“红五类”学生的辱骂毒打，母亲曾经有好几次在半夜时分悄悄爬上家中临街四楼的阳台栏杆，对着满城昏暗的灯光独自垂泪，随时都准备跳下去。幸好每次都被一直呆在家里，格外机灵的幺兄弟小渝发觉，跪在楼板上苦苦哀求，母亲方肯下来。幸好不久学生造反派崛起，在已成为造反派勤务员的聂老师儿子聂嘉陵和隔壁另一老师的帮助指点下，母亲才及时地从皮带拳头下脱身。我们几兄弟姐妹才在那个处处陷阱的岁月里，保有一个堪称为家，可以落脚，可以舔伤的一隅。

另一首让人不能忘却的红歌是，不知谁为副统帅语录谱写的《完蛋就完蛋》，尽管其旋律平庸得近乎于诵经，毫无艺术张力，但却有一股冲天杀气和敢于用生命作赌的狠劲，且又朗朗上口：“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勇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声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1967年5月，我和渔场的三十余名知青，就是唱着这支歌，抱着誓要讨回公道的决绝，举着大刀长矛，杀进大竹县城，令数千装备有钢钎大刀长矛的当地造反派，在冲天杀气的歌声中，惊呼“渔场崽儿不要命了”，于瞬间溃不成军。

大竹云雾茶场有一个名为汤中林的眼镜知青，在西师中文系大二时查出肝炎休学来到茶场。此君瘦小文弱举止儒雅。1968年全川武斗重启时，他所在的反到底武装，在渠县庞家嘴一带和815派遭遇，寡不敌众身陷绝境时，据说就是唱着“完蛋就完蛋”，拉响手榴弹“壮烈牺牲”的。

还有渔场繁殖队的同事，身材瘦小的陈国文，1967年11月大竹反到底被赶出大竹，在达县军分区枪械库抢枪时，当作为行动信号的《完蛋就完蛋》刚刚响起，率先冲过部队画出的警戒线，第一轮机枪响起时就倒在了血泊中。

从反右、大跃进到大文革，直至今天，红歌的社会功能定位，始终如一地一以贯之，从来就没有过改变：一边用美丽的期许煽起狂热，用乌托邦梦境代替常识，蛊惑驱赶着丧失理性和判断力的人们，从一个灾难奔向另一个灾难，直至生命的终结。一边用虚假的辉煌瑰丽湮没现实感受，掩饰现实中的挫败压抑和痛苦，忘记无处伸张辩说的冤屈，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炫技式的乐音下，失去思辨力，失去记忆，沦为工具、棋子和简单的数字。

正因为工具的功能定位，红歌才背离了历史与生活的真实，失去了价值和真实的灵魂。在当代作曲家们琴键下流出的旋律，几乎全都是用矫情虚假和技巧堆砌串缀起来的一堆音符垃圾。

五、今昔红歌，此红与彼红

如果说当年响彻在巴士底狱广场上的《马赛曲》还算不上严格意义的红歌，那么，从巴黎公社血泊上兴起的《国际歌》，尔后的《华沙工人歌》，苏联以战争、革命、离别、爱情和苦难为题材的众多歌曲，国粹版的《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赞美新中国》、《咱们工人有力量》……无疑都是当之无愧、最正宗的红歌先河与样板。

那些简洁质朴，却又极富感染力，激荡着火一般炙热的理想、愤怒与渴望的旋律，无论艺术水准及感染力、当代红歌都绝难望其项背。两者根本就不在同一审美层面。或者干脆说，两者间的审美方向根本就是互为反动的。

那些曾经让无数热血青年抛弃平安优裕的环境和个人前途，义无反顾地集结在自由民主和理想旗帜下，甘愿为之献身为之奋斗的红歌，何以仅仅在一度辉煌之后就每况愈下？以至现在而今眼目下，竟得依靠装腔作势拿腔拿调，依靠歌星们在舞台上撒娇卖嗲，才能吸引到足够的眼球和耳朵？

其实，答案再明白不过。

当“他是人民大救星”取代了“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当“永做革命螺丝钉”回应了当初“为什么？为了求解放”的渴望和呐喊，当“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变调为“党啊，亲爱的妈妈”，早期红歌的审美价值和取向，就已被全面颠覆。

不然，在数千万农民工依然在码头工地挥汗如雨的今天，一度唱响海内外，同是聂耳作曲的《码头工人歌》何以会销声匿迹，不知所踪？显然是因为“在血和汗的上头，他们盖起楼房来”那种直指社会不公，近乎怒吼的旋律，正是当代红歌力图屏蔽的。

有过“让思想冲破牢笼”的石破天惊。有过在《赞美新中国》里以“人民胜利了，从此做主人”的诱人光芒和期许的红歌，在历经了几十年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后，经历了与实用和利益的“结合”后，就从理想浪漫的云端跌落。为了近在眼前的功利实用，艺术的高雅和高贵，就变成了充满虚伪媚态的丑陋，变成了匍伏在威权脚下的宠物。

是理想给红歌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而后又恰恰是声称要将理想变成现实的革命本身，拔光了她美丽羽毛，折断了飞翔的翅膀。

真实，历来都是艺术不可或缺的灵魂乃至生命，一旦背离心灵的真实感悟，就失去了艺术的根基，失去了她的尊严与高贵，还有唤起共鸣的基础。路越走越窄，直至穷途末路就势在难免。

当前，红歌最大最紧迫的困境，是如何将其早期的维权鼓动转变为维稳帮腔，如何让挣扎于失望和屈辱中的人们高唱幸福和感恩，如何让焦虑无助的下岗职工、拆迁访民去高唱前程似锦，甚至如何让那些黑煤窑和血汗工厂中的童工不知道曾经有过“吃不饱，睡不好，痛苦的生活向谁告”（聂耳《卖报歌》）这样的“红歌”。这绝对是当代红歌词曲作家们永远都无法绕过的绝壁和沼泽。那一套和生活真实完全背离的概念和语境，连词曲作者们自己都不信，何来灵感和真情？除了矫情，除了扭捏作态，虚情假意地卖弄技巧和媚态外，岂有他途！

然而，凭几首走红的歌就能当将军，与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的职业军人相比，如此低成本的、无任何风险的路径范例，却又那样诱人，诱得人心痒难熬，有几人能不怦然心动？尤其是那些早已“悟透了”的人们，如何能不趋之若鹜，应者如云？

何况“表演”和“秀”历来是“艺术家们”的拿手强项，谁不会装？会装就必有重赏。于是，你装我也装，曲儿小腔儿大，矫情卖嗲、讨好献媚，虚张声势，拿腔拿调，思想苍白，言之无物，就成了当代红歌最普遍最流行的时尚。

就笔者亲眼目睹，仅仅一轮红歌潮，就为那些末流或不入流且又不甘寂寞的艺术家们提供了众多难得的挣钱出名机会。

但草根百姓毕竟是清醒的。即使在红歌运动如火如荼的那几个月，几乎所有红歌会，无论规格高低，规模大小，何等隆重光鲜，却永远都是演员远远多于观众。这无疑是草根百姓对红歌最耐人寻味的表态，是早就听烦了、听厌了，在千篇一律的老套虚假下耳朵磨出了老茧，公民意识已经觉醒的人们，在红歌与现实的完全相悖中“用脚投票”。

笔者认识好几个在重庆颇有声誉的合唱指挥。他们对任何歌曲内容和价值指向似乎都不太在意，每当我抱怨合唱队唱红歌唱得倒胃时，他们总是满不在乎地答曰：“不管啥子歌，只要唱好了都一样好听。”这也许和文革初期，我们在石灰窑边就着太阳咪虱子一样，红歌在他们眼里只是声乐练习曲或炫技工具而已，或者干脆是类似“提起宋老三”，用以打发无聊的小调。

这显然又是一种取向和态度。

对这一切，作为举办方的各级政府官员，肯定比谁都清楚。时至今日，红歌不可能再成为政治动员令。至于唱出“精气神”云云，不过是台面上的自欺欺人。他们都明白这是“态度问题”，“党性问题”。何谓党性？过去说“党性是阶级性集中的体现”，现在这些红歌会的主办者还能代表什么“阶级”？他们只知道看上级的眼色行事，博取上位升官发财才是唯一的动力。至于红歌演唱庞大的费用开支，浪费的时间金钱和资源，一律由纳税人买单，不用自己掏一分，何乐不为！

作为一个资深合唱队员，自从红歌成为唯一的合唱曲目以来，我曾经无数次在经典曲目的排练演唱中享受过的愉悦就再也体会不到了。

如果说“当今世界，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是逆流”依然是真理，那么歌唱“大救星”显然就是对《国际歌》的反动，是反动逆流中泛起的泡沫。

那些颂扬权力崇拜，鼓吹暴力，用服从取代自由发展和解放，用感恩取代思考与判断，用莺歌燕舞掩盖社会不公的当代红歌之“红”，和当年聂耳、冼星海们所讴歌所向往之“红”，绝对不是同一种“红”。

一旦鼓动底层民众奋起维权的歌变成了严防“群体事件”、拼命粉饰现实的维稳的歌，一旦“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之“红”被篡改必须永远坚持的“领导核心”之“红”，革命就蜕变成了王朝更替。此“红”就绝非彼“红”。严重变异的“红”，就失去与生俱来的魅力和美，更遑论正当性与合理性。

无怪乎这些年每听到某些红歌，总有一种大清王朝长辫隐约可见的奇异感觉。那分明是一群匍伏在利益诱惑前，奴才气十足的势利之徒，讨要赏赐的拙劣表演。

其实，艺术就是艺术，艺术的使命就是涵养情操，培养审美意识，唤起对美的追求。最起码，不能背离生活真实，不能沦为权力的工具和仆役。

唯有如此，我们曾经在“红歌”声下所经历，所遭遇的灾难、浩劫和悲剧，才可能绝迹。

欧洲旅游醒脑记

林宪君

我到欧洲旅游的动机有两个：一是实现少年时的梦想；二是揭穿某些政客的谎言。

近几年，政客们又是写文章，又是作演讲，口沫四溅地教训我们“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绝不搞三权分立，更不搞多党竞选……”云云。

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他们只要听到“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这类字眼，就强烈地反感，硬说这些都是西方独有的价值观念而深恶痛绝。他们为什么反感、痛恨、恐惧“西方那一套”？其中必有难以启齿的隐情。“三权分立”和“多党竞选”究竟有什么不好？他们又不敢向民众公开讲。即便有人质疑，多问几个为什么，衮衮诸公也无可奉告、讳莫如深。

这批色厉内荏的政客们，既要气壮如牛地把民众当傻瓜来欺骗，又害怕人们揭穿自己的谎言。自以为封锁言论、扼杀新闻自由就可掩盖事实真相。其实他们这样做是在给共产党脸上抹黑，丢共产党的脸。

早在 40 年代，共产党就公开发出了声音：要“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1945. 4. 23 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主张“推行民主政治、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1941. 10. 28《解放日报》）“我们应当把民主国家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行民主的榜样。”（1944. 4. 19《新华日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主而努力，所要的自然真是真货，不是代用品。不要拿民主的代用品来欺骗我们啊！”（1945. 1. 28《新华日报》）。如今，这些共产党的叛徒们竟把千百万革命先烈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奋斗目标，污蔑为“西方那一套”拒之门外，真是可恶可恨！

为了弄清真相，搞个水落石出，我决心到西方国家走一走、看一看，揭穿政客们的真实嘴脸。2010 年 3 月与老友刘启昌相邀参加了“欧洲八国十五日游”旅行团。虽沿途跑马观花，浮光掠影，仍感获益匪浅。

一、感受慕尼黑的社会治安

3 月 16 日上午，天鹅旅行社的刘艳小姐电话通知我：意大利大使馆已批准我的出国签证，要求今天立即出发前往北京集中，我与启昌匆忙收拾行装，来不及去银行兑换欧元，当晚就乘飞机赶往北京。

17 日上午，来自全国各地的 20 名游客，由凯撒旅行社的汤彦先生带队，从北京飞往德国巴伐利亚州州府慕尼黑。由于时差，经过 12 个小时的飞行，到达慕尼黑机场尚未天黑。前来迎接我们的是旅行社的大巴司机奥地利人伊萨克（ISAK）。此人 1.9 米的个头，鸚鵡脸形，操着生硬的中国话：“你们好，上车了！”晚上住在离慕尼黑约 10 公里的一个小镇酒家。

初次出国，既新鲜又兴奋。也许是时差关系，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凌晨五点，天还未亮便洗漱完毕，与启昌外出散步闲逛。

走出旅店大门的第一印象，是德国的良好社会治安。旅店设在公路边一座静谧的小庄园。大门通夜不关闭。任何人都可自由进出。旅店大厅灯火通明，服务台上陈列着啤酒、饮料之类的物品，均无人看管，由旅客自行付款取用。旅店门窗紧靠公路，无任何防盗铁栏。公路两边停放的自行车、摩托车均未上锁，随时都可被人骑走。住户们的一些重要物品摆放在大门口，可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由中国而来，倍觉不可思议，这种环境在中国完全是窃贼们的天堂，在德国的慕尼黑却安然无恙。

我与启昌轻手轻脚离开旅店，漫步在小镇及郊区小路上。直到东方破晓，路上才有稀疏的车辆和行人。回到旅馆，我们二人都十分佩服德国的良好社会治安。

二、由慕尼黑去意大利途中见闻

3月18日，游览慕尼黑老城区的中心——著名的马丽恩广场。广场中间竖立着一座高高的圣母怀抱婴儿黄金塑像。据说这座雕像由民众集资兴建，为纪念当年巴伐利亚反抗瑞典人血洗慕尼黑城取得的胜利。广场北面是马丽恩大教堂，这座巍峨挺拔的哥特式建筑，装饰华丽，布局恢弘。游人可自由进入参观。广场南面是圣彼得大教堂，我们推门而入，圣徒们正在作祈祷。神甫向我们示意：安静。游客们屏息呼吸、蹑手蹑脚将教堂草草浏览一遍，便匆匆离开。走出教堂，忽闻金碧辉煌的教堂屋顶响起了庄严肃穆的钟声。两座教堂钟声此起彼伏、清脆响亮，仿佛是来自天堂的召唤，劝告人们弃恶从善。置身于庄严的宗教殿堂，感觉自己已超凡脱俗，对人间喜怒哀乐已不关痛痒。宗教信仰使灵魂净化，暮鼓晨钟令人头脑清醒。

离开慕尼黑，沿着阿尔卑斯山前往意大利。已是3月中旬，阿尔卑斯山顶仍皑皑白雪，山下林木茂盛，碧绿的莱茵河在公路旁缓缓流过，田野里看不见劳动的人群。山坡上一排排五颜六色的木板房，远看宛如儿童玩的积木。导游说，在此生活的居民早已消灭了城乡差别。散居在山坡上的农户，每家每户都有汽车，外出办事购物极为方便。晚间人们都在家中享受安详恬静的田园生活。大城市的喧嚣拥挤已令人生厌，每年来此旅游度假的人络绎不绝。在德国和意大利，越是远离闹市的偏远小镇，越受旅游者的青睐和欢迎。

中午，大巴在奥地利的西部城市因斯布鲁克停车小憩并进午餐。饭后顺便溜达观看市容。这里原是神圣罗马帝国东罗马的一部分。1740年，查理六世的长女玛丽亚·特丽莎继承王位后，在此推行“开明君主制”，实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位年轻的女王颇似中国唐朝的武则天，身怀雄才大略，善于同各种政治势力周旋，曾多次以外交手腕令国家转危为安，在她的率领下，奥地利不断走向富强和繁荣。

女王一生共育16个子女。11个女儿都为联姻远嫁异国他乡。女儿中命运最为悲惨的是嫁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小女儿，法国大革命时期，她随夫君被送上巴黎协和广场的断头台一同问斩。

我正沉浸在回顾奥国历史的瞬间，大巴已驶入意大利北部的波河平原。亚平宁半岛的波河平原，是意大利最富庶的地区，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尤其靠近亚得里亚海那片绿如翡翠的沿岸，被人们称为欧洲的后花园，这片得天独厚的度假胜地，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海滩上享受温馨和煦的阳光。据说当年大诗人海涅、拜伦、雪莱等人都对这片美景流连忘返。

古罗马帝国时期，意大利仅是帝国领土的一部分，偌大个地中海被视为帝国的内湖。这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在历史上曾继承发扬了古希腊文明，对欧洲文明的进步功不可没。

罗马帝国灭亡后，又经过一千多年中世纪的黑暗岁月，意大利已分裂为若干独立的王国、公国、自治城市和小领地。各国之间割据分治，纷争不断。1861年，撒丁王国国王伊曼努尔二世征服合并了伦巴底、摩德纳、托斯卡纳、西西里、威尼斯和罗马，才真正完成了意大利的统一。我们在威尼斯和罗马，许多广场都竖有伊曼努尔二世的青铜塑像，以纪念这位统一意大利的君王。

意大利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天主教国家。沿着波河平原南下，公路两旁的天主教堂鳞次栉比，目不暇接，教皇国的遗迹遍地都是。特别惹人注目的是建在山顶上的修道院，修行者住在山顶居高临下、脱俗超凡，与上帝的距离最为接近。

公路两旁的城镇建筑都与当年的文化古迹有关。维罗纳这座小城的名气就与莎士比亚有缘。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就在此城。这里的文化气息极浓，每天都在举办各种

形式的演唱会，来自世界各地的痴情男女，纷纷聚集在朱丽叶的阁楼窗下，仿效当年的罗密欧，高唱向朱丽叶求爱的小夜曲。阳台下的墙面，刻满了众多“现代罗密欧”信誓旦旦的爱情宣言。

不知不觉大巴已开到离威尼斯不远的帕洛瓦。住进旅店已疲惫不堪，赶快洗漱完毕上床休息，以便养精蓄锐等待第二天游览水城威尼斯。

三、泛舟威尼斯

威尼斯是一座风貌独特的美丽水城，其建筑风格独一无二。全城海水环绕，仅东北角一条长堤与陆地相连。市内纵横交错的大小河流 177 条，将威尼斯分割成 120 多个小岛。岛与岛之间又有 400 余座形态各异的石桥相连。有些人习惯于把威尼斯称为“百岛之城”。

威尼斯又是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的故乡。公元 1271 年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出发远道而来中国。先后在元朝供职 17 年，颇受元世祖忽必烈的信任。他经常奉命巡视各省，足迹几遍中国。1295 年他返回故乡威尼斯，在战争中被俘关在狱中。关押期间他口述了自己的东方见闻，记录下来便是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想起这段历史感慨万分，原来 700 多年前的一个封建帝国都能容忍外国人在中国做官，其政治气度远远超过当今的干部选拔标准。

威尼斯城已有 1600 多年的历史。当初的先民为何要把城市修建在海上？据传，公元五世纪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居民常为亚洲入侵的游牧民族骚扰、掠夺，为躲避战乱，人们纷纷逃往海边荒岛和沼泽地带，采用在海水中打木桩的方式重建自己的家园。据统计，威尼斯全城由 100 多万根大树桩打入海中，人们年复一年在这些木桩上盖起了房屋，修筑了道路。历时 800 余年，一座座金碧辉煌的高楼拔地而起，顽强的威尼斯人终于建成了这么一座美丽诱人的水上城市。

我们下车后改乘大船，由外河驶入市區，在伊曼努尔二世铜像旁的圣马可广场登岸。游威尼斯，除了坐船就是步行，其他交通工具无法登上这座水城，威尼斯最有名的交通工具叫“贡多拉”小船。往昔，它是达官贵人的出行工具，如今已是旅游观光的必选项目。我们紧跟导游疾步向停靠“贡多拉”小船的码头奔去，每 6 人一船，坐稳后由一名船夫在船尾掌舵行驶。这种小船最具威尼斯的独特风貌，小船首尾尖翘、黑色平底、狭长单桨，坐在上面穿梭于水巷之间别有一番情趣。水巷两旁为条石砌成的旧式楼房，里面虽有商店售物却极少有人居住，楼与楼之间都由雕刻精美的石桥相连。桥上行人漫步、桥下小船穿行、水由门前过，船在脚下行，诗情画意油然而生。海鸥时而水面嬉戏、时而翱翔蓝天，此情此景如梦如幻，仿佛走进童话中的仙境。

穿过弯弯拐拐的水巷，小船已驶入宽阔的河道。右岸是威尼斯市政厅所在地，马可·波罗故居依然不减当年风采。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即以此处为背景。若要抒发思古之幽情，古代威尼斯的繁华景象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仍会依稀浮现在眼前。

小船拐弯时，忽闻远方高亢嘹亮的男高音，时而传来手风琴悠扬的伴奏声。循着歌声望去，原是一位身穿燕尾服的老者站在船头放声高唱。第一首曲子是帕瓦罗蒂红极一时唱过的《我的太阳》，第二首曲子是我早在五十年代就熟悉的《桑塔·露西亚》。这首歌词至今还记忆犹新：“看晚星多明亮，闪耀着金光；海面上微风吹，碧浪在荡漾；在那黑夜之前，请来我小船上；桑塔·露西亚、桑塔·露西亚……”歌声委婉动人，扣人心弦。登岸良久，仍余音绕空，不绝于耳。下船方知，这位唱歌的老者是该船游客以每人 75 欧元的价格“租”来助兴的“艺人”。这些意大利人可真会享受生活，任何场合都在及时行乐。这种豪放乐观的性格，潇洒自如的生活深深地感染着我。人生一世何苦争名夺利，“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看看人家的生活态度，也许不会再折磨自己，与自己过不去。

威尼斯的大街小巷游人如潮却无车马之喧。交通工具是船，人们以船代步。下船只得步行，走进圣马可广场，可仔细品味威尼斯这颗亚得里亚海边璀璨明珠的旖旎风光。威尼斯的古迹繁多，有

120 多座教堂、120 多座钟楼、40 多座宫殿和 64 座修道院。规模最大的圣马可教堂，是为耶稣的门徒圣马可而建。这座教堂已有 1200 多年的历史，全部由精雕细刻的大理石砌成，四壁都镶嵌着五颜六色的玻璃，在阳光折射下金光灿灿。传说圣马可的遗骸埋葬于此，每年都有千百万虔诚的信徒前来朝圣，来此观光的游人络绎不绝从无间断。

圣马可是《新约全书·马可福音》的作者，也是威尼斯水城的保护神。以圣马可命名的广场是威尼斯政治、宗教和传统节日的活动中心。拿破仑把威尼斯称为“举世罕见的奇城”，把圣马可广场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客厅”，可想而知，这座城市的魅力非同一般。

威尼斯水城这条亮丽的风景线，多少年来都为押往刑场的犯人所向往。当他们走出地牢看到眼前的无限风光，囚徒们路过桥边个个都为威尼斯的良辰美景唉声叹息，后悔蹉跎了自己的美好人生，被押犯人所走过的这座桥取名为“叹息桥”。

在威尼斯还观看了被称为“威尼斯一绝”的吹玻璃工艺。游人坐在木质看台上，一名工艺师从熊熊的炉火中迅速取出一块溶化的玻璃球，只需要三分钟左右的时间便熟练地扭捏成一只栩栩如生的奔马。看官们个个啧啧称奇，掌声不断。表演完毕店主立即向游人推销各种玻璃艺术品。他先拿起一只做工精美、色彩鲜艳、玲珑剔透的玻璃茶杯，用小木棍轻轻敲击，茶杯发出清脆悦耳的颤音；接着他又拿起另一只图案相同的茶杯，敲击起来却音色沉闷如同瓷碗。店主让游人分辨：前者是正品，后者是仿制的赝品。就在这一瞬间，他对看官们狡黠的一笑，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把假的买去送丈母娘，把真的买来送给妈妈，谁也不得罪”。说完又得意的哈哈大笑，不少人果然被他的幽默说动了心，当场就慷慨解囊。我想，这大概就是“威尼斯商人”经商的诀窍吧！

四、文艺复兴的发源地——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城修建在阿尔诺河谷一块平原上，四周都是蜿蜒起伏的丘陵。这里气候宜人，四季鲜花盛开，被称为“鲜花之城”。在意大利语中，佛罗伦萨即“花之都”，徐志摩将其译为“翡冷翠”，倒也十分确切。每年春暖花开，这里游人如织，擦肩接踵、热闹非凡。来此游玩的人无不流连忘返。

佛罗伦萨的老城区原是图斯卡纳拉首府所在地，遍街都是名胜古迹。该市最有吸引力的是君主广场，位于全市的中心。广场上陈列着不同历史时期众多雕塑名家的杰作。较为著名的有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全裸石雕复制品；有佛罗伦萨城邦统治者科西莫一世的骑马青铜像；有海神波赛东喷泉以及海克力斯和凯克斯的大理石雕像，各种作品形象逼真、姿态各异、神采飞扬、栩栩如生，这里真不愧为一座露天雕塑博物馆。

广场中间备有中世纪豪华马车，可供游人观光。马车上的游人身着古装，腰佩长剑穿梭于广场两端，初来乍到感受的是时光倒流的气氛。我们只顾观摩各种雕像，与其合影留念，无暇欣赏当今的人造景观。

佛罗伦萨不仅是一座鲜花之城和露天雕塑博物馆，它还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甚至可以称为整个欧洲文化的发祥地。这座城市到处都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它是文艺复兴时期诗歌、绘画与雕塑的摇篮。十四世纪的伟大诗人但丁即诞生于此。在但丁故居前，慕名而来的游客只顾摄影留念，我却想起一段痛苦的经历。1957 年的冬季，我把但丁在《神曲·地狱篇》首页的两句诗：“正当人生旅程的中途，我在一座昏暗的森林中甦醒……”抄在日记的扉页上，但丁是在人生的中途，即 35 岁那年大彻大悟、看破红尘，而我，只有 22 岁。在一座比昏暗森林还要黑暗的环境中甦醒。从此我不再相信各种欺骗和谎言。

下午，我们游览了佛罗伦萨的心脏——圣母百花大教堂。天空艳阳高照，教堂在金灿灿的阳光下亭亭玉立、神采迷人。登上教堂屋顶俯瞰市容，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处建筑都堪称精美的艺术品。佛罗伦萨，这座古老的艺术之都，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它引领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解放了人们

的思想。正是发源于佛罗伦萨的文艺复兴，使人们摆脱了中世纪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束缚，开始大胆地探索人性的自由、人类的平等以及通往幸福安康的桥梁。文艺复兴引发的社会变革，彻底摧毁了欧洲中世纪残暴野蛮的封建专制制度，为人类走向民主自由扫清了障碍。

历史上，佛罗伦萨人才辈出，它拥有众多名声显赫的才子，如但丁、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人，这些名字曾为人类的进步作过重要贡献，足以让这座城市永远不会被人们遗忘。在文艺复兴全盛的1490—1530年之间，佛罗伦萨的文学艺术已达到世界的顶峰。1506年，被称为文艺复兴“艺坛三杰”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曾在此聚会。这一历史事件被视为艺术史上的千古美谈。

最令人遗憾的是，1469年佛罗伦萨出生了一个叫马基雅弗利的人，自从此人发表了一篇歌颂专制独裁的《君主论》，大力提倡“统治者为实现目的，可不择手段”之后，大大小小的法西斯分子纷纷奉为圭臬，将其捧为实行独裁统治的理论依据。他们不再对人文主义有兴趣，而是更加崇尚权力与暴力。至今，马基雅弗利主义仍使那些嗜痂逐臭之徒和个人野心家们趋之若鹜，狂追不已。几百年来，这股历史逆流一直企图阻挡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另一方面，由文艺复兴运动所开创的自由民主精神，仍由意大利不断向外蔓延传播，通过与世界各国在政治、思想、文化诸方面的相互碰撞和交流，已被人们所广泛接受。自由民主精神已成为时代的主流，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主要动力。

五、条条大道通罗马

罗马的故事太多太多，公元前700多年就有母狼育婴的传说。罗马城的起源，据说是母狼哺育过的婴儿罗慕洛所建，他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新城，这就是最早的罗马城。今天，罗马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座“母狼育婴”的青铜像，为的是纪念这个古老的传说。

过去，看过许多发生在罗马的故事，罗马的真实面目只能是在想像中掠过。如今身临其境，方知这座城市并不陌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哦！原来是上世纪50年代看过的影片《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罗马11点钟》、《偷自行车的人》和《罗马假日》等留下的印象太深了。

3月21日，旅游大巴沿着亚平宁山脉南下，一条大路直通罗马。一排排形似大蘑菇的地中海松从面前一闪而过，不到四个小时就到达向往已久的“永恒之都”——罗马。

罗马分为老城区和新城区两部分，重点是游览老城区。大巴缓慢地行驶在狭窄的街道上，我们有充裕的时间欣赏道路两旁景色。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路旁种满了广柑树，金黄果实挂满枝头。累累硕果伸手可及，已是三月份季节，树上的广柑仍无人攀摘。

漫步在古罗马街头，遍地都是名胜古迹和古建筑的残垣断壁。它像一座巨型历史博物馆，帝国大道两旁密集地竖立着历代帝王将帅的铜像，其中有凯撒、安东尼、奥古斯都和图拉其等。在他们统治罗马帝国时期，创造了帝国强大鼎盛的辉煌；如今，仍在向人们展示其昔日魅力。2000多年前垒砌的薄砖城墙，即使垮塌破败，仍被市政当局保存如初。历届执政者都未以“市政建设需要”而随意拆毁。罗马人充分利用先辈们留下的古建筑以及全部文化遗产发展旅游业，既给后人保存了历史真实，又能不断地为自己和子孙后代造福。比起那些厚今薄古、眼光短浅的执政者，确实高明得多。

罗马新城区距老城约6公里。这是一座新建的现代化花园城市，处处弥漫着春天的气息。徜徉在花的海洋中，欢乐无比，心旷神怡。

听说罗马有四多，一是教堂多，全市大小教堂450余座；二是雕塑多，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雕像作品随处可见，几乎遍街都是；三是喷泉多，共有3000多个；四是广场多，数量居世界之首，每个广场都“条条大道通罗马”。

六、罗马市的国中之国——梵蒂冈

梵蒂冈教皇国早已不具昔日的辉煌。如今仅保留在罗马城内西北角的高地上，占地 0.4 平方公里，全国人口只有数千人。

我收藏有两枚教皇国时期的历史银币，一枚是 1834 年发行的教皇格里高利十六世，背面为展示圣婴的耶稣五人群像，面值一斯可多；另一枚是 1870 年发行的末代教皇、自称梵蒂冈囚徒的庇护九世，面值 5 里拉。教皇国灭亡后，意大利王国定都罗马，庇护九世拒绝接受 1871 年意大利国会通过的《教皇保障法》，不承认教皇国已灭亡。为表示抗议，他发誓不越出梵蒂冈一步，自称“梵蒂冈囚徒”。

梵蒂冈这个国中之国的蕞尔小国，麻雀虽小，肝胆俱全。至今还在行使一个独立国家的全部权利。它是各国天主教会的领导中心，与许多国家都建立有外交关系。

梵蒂冈的唯一景点是规模空前庞大的圣彼得大教堂。教堂内外可容纳 50 万人。从 1506 年开始兴建，历经 120 年的漫长岁月于 1626 年全部竣工。最早的建筑师叫布拉曼特，教堂尚未完工就已去世。后来接手的设计师都为此献上了毕生的心血。其中著名雕塑家米开朗基罗和著名画家拉斐尔都先后接手过圣彼得大教堂的设计任务。三百多年来这所教堂已珍藏有欧洲艺术史的众多无价之宝。

我们跨进圣彼得大教堂的中心，顶端是一巨大圆形铜质华盖。这一高大的圆穹直径有 40 多公尺，向上望去，有如天穹罩在十字架形通道上，意为十字架与天堂永不分离。华盖上镶嵌着圣彼得的彩色画像，两旁是手捧圣水的安琪儿在天空展翅飞翔。彩画光彩照人，华丽无比，是由著名建筑师贝尔尼尼亲手所制的典型巴洛克艺术珍品。这一雄伟建筑是文艺复兴风格的代表作，也是这一运动的思想风格和气息的体现。进门后右侧陈列着米开朗基罗 25 岁时创作的大理石组雕《母爱》。它是这座教堂中最珍贵的雕像。是唯一刻上米开朗基罗名字的作品，即他尚未成名之前的一件杰作。他把圣母玛利亚雕刻得年轻美貌，哀痛地搂抱着死于十字架上的成年儿子耶稣。耶稣身上的伤口仿佛还在流血。近观裸身的耶稣全身肌肉、血管、汗毛均清晰逼真。作品显示出年轻的米开朗基罗已对人体解剖学的掌握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成名后，人们对其艺术天才推崇备至，将这座《母爱》组雕奉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如今，它已是圣彼得大教堂的镇馆之宝。

其余各处均有大理石雕像，每一个角落都布满装饰，令人眼花缭乱，连地面也用彩色大理石铺成。教堂内分许多小堂，每一个小堂都有一名教皇的遗体。教堂中门旁有扇门平时紧闭，被称为“圣门”，只有在某些特殊日子才准打开。此门可直通地下室，里面是存放教皇、大主教遗体的处所，有如迷宫，纵横交错摆放着 247 具遗体。

整座教堂中只有一幅壁画和一幅油画，其余全是用指甲大小的彩色大理石块镶成的巨幅镶嵌画，色彩无比鲜艳，经久不衰。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和拉斐尔等人的著名绘画几乎都陈列于此。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留下的这批文化艺术瑰宝，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对每个追求自由幸福的人来说，都具有永恒的魅力。其实，它们的真正价值还在于：这些作品昭示着人性的复甦，人类正在向死气沉沉的野蛮的中世纪告别。在拉斐尔的笔下，圣母玛利亚和耶稣，都是活鲜鲜的人，而不像天上的神，他们的造型都反映了人们渴望自由、解放，都是要求摆脱束缚的写照。从作品本身已体现了母性、人性、人间理想的回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文艺复兴运动引发了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人类理性的跃动，人们已开始寻求人的价值和尊严。由此产生的自由思想和民主精神，终于改变了人类的命运，鼓舞着人们把自己从中世纪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大功绩在于，它预告着人类的新世纪已经来临。自由平等的思想，科学民主的精神，从实质上决定了人类历史的走向，并引爆了我国的“五四”运动。1919 年，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的“科学民主救中国”的

口号，就是文艺复兴精神的传承。近百年来革命先烈追寻的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虽然这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历史潮流，但仍为一切独裁者所恐惧和仇恨。

七、从梵蒂冈一步跨入罗马

梵蒂冈这个弹丸之地的小国能在一个大国的包围中长期生存确实不易，若在有些国家早已被武力所消灭，意大利却能容忍它的存在。从圣彼得教堂出来，左脚还在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右脚已跨入了意大利的罗马。

我们跟随汤导去看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斗兽场。这座高大的建筑物是古罗马帝国时期留下的著名景观，它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如今已残破不全。从场外可看到内部有几层观众席，可容 8 万多名观众。它修建在著名暴君尼禄的御花园旧址上。公元 72 年，罗马皇帝维斯帕西亚诺下令兴建，公元 80 年由他的儿子提图斯皇帝完工。提图斯在公元 70 年征服耶路撒冷，带回 10 万俘虏，其中 4 万人用了近 10 年时间建成了这座庞大雄伟的斗兽场。如今站在这座坍塌近半的建筑物前，仍会为当年血淋淋的杀戮场面感到毛骨悚然。哪些酒醉饭饱的贵族们为了消闲，在此观看人与人斗、人与兽斗取乐，高喊着“杀死他”！以这类野蛮游戏满足自己的感官。其实，这种杀戮游戏与中国历代的杀人游戏相比，不论其规模花样与手段都不过小巫见大巫而已。

斗兽场旁边是著名的君士坦丁凯旋门。据说拿破仑受此凯旋门的启发，模仿其建筑风格，兴建了巴黎凯旋门。君士坦丁凯旋门规模小得多，但比巴黎凯旋门要早 1500 年。

罗马市内还有个叫“真言之口”的景点，位于古罗马废墟和帝国大道的尽头。这里仅是一处雕刻着海神波赛东头像的圆形出水口。因《罗马假日》影片的公映名声大噪。传说，若说谎者把手伸进海神之口，手便拔不出来。影片中那位扮演赌徒的帅哥格力高里·派克与扮演逃公主的倩女奥黛丽·赫本在此游玩，帅哥假装把手放进海神之口拔不出来，吓得可爱的公主尖声大叫。这个喜剧噱头吸引着众多痴女情男来此观光旅游，纷纷模仿这位帅哥恶作剧。我和启昌两个 75 岁的疯老头也兴致勃勃地把手伸进海神之口，摄下一个难忘的镜头。

罗马老城区还有个西班牙广场，也是个令人留恋向往的地方。这里游人如织，来来往往如过江之鲫。西班牙大使馆这所古老的建筑仍悬挂着国旗，一如既往照常办公。大使馆斜对面是连接圣三山教堂的一片广阔石梯坎，游人到此都要坐下休息、聊天。据说文化名人拜伦、济慈、雪莱、李斯特等人都曾在此逗留盘桓。我与启昌来到这里当然要考虑名人效应，在石梯坎上小坐，亲身体验文化名人的潇洒浪漫。

最扣人心弦的是亲历幸福喷泉。这里又叫许愿池、少女泉、特拉维喷泉，是罗马市内最著名的一座喷泉。1762 年建成，施工时间长达 30 年。喷泉的背景是大理石群雕像，描绘海神尼普顿凯旋归来。海神站在海贝壳上由众女神和两匹海马拉着通过凯旋门。墙上的 4 名女神代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个个栩栩如生、妩媚动人。在喷泉入口处，人们背对水池，向水池中投放硬币。据说这样便有机会重返罗马，并为自己带来好运。来到此地我也如法炮制，事先带了一小包硬币，至少 40 几枚。我背对水池不断投币，口中念念有词，心中默默许愿。全是家人幸福安康、孙辈学习成才之类的心愿。我一口气投掷了几十枚硬币，历时十多分钟，这一奇异举动吸引了不少游人的眼球，纷纷驻足观看，几个金发碧眼的少女笑得乐不可支，不断向我挤眉弄眼，以为这个中国老头有点疯癫。许愿完毕，感觉周身轻松，我坚信所许下的愿都能全部兑现。

跨出许愿池栏杆，再上几步梯坎便是繁华的闹市区，各种生活用品摆满了大街小巷，马路对面十字路口有一尊白色“自由女神像”，她手持火炬，头戴金冠，丝纹不动。我走近她身旁打算与其合影留念，她突然后退一步，并对我眨了一下眼，胖胖的圆脸上似乎露出了笑容。我突然明白，原来这个“自由女神”由活人化妆扮演。她脚下还有个乞讨的小钱罐，里面装有零星的纸币和硬币。

我没有欧元只有俯身放进两枚一元的人民币。并请启昌为我拍下一张与“自由女神”合影的照片以示纪念。我觉得西方人这种乞讨方式比当惯了奴才的中国人磕头如捣蒜的方式更具有人的尊严。

八、在比萨斜塔下思考

大名鼎鼎的比萨斜塔，早就如雷贯耳。既然来到意大利，岂能轻易放过？尽管要自掏腰包，也在所不惜。当地政府为保护古迹，不许旅游大巴进入市区，我们只有转乘公共汽车到此游览。

比萨曾属罗马帝国管辖，帝国消亡后长期是个独立国家。公元十至十二世纪是比萨的黄金时期，许多精美的建筑都是这一时期建成的。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建于 1053 年的圣母玛利亚大教堂和建于 1174 年闻名遐迩的比萨斜塔。

比萨斜塔是建在市中心广场上一座钟楼，因倾斜而成为闻名世界的奇景。塔身为圆形，全部用大理石砌成，全塔重约 14 万吨。当初建塔式未考虑到地基的牢固度，由于地基不深，建到第三层塔身开始倾斜，因多次补救无效被弃置多年，直到 110 年后的 1284 年重新修改了施工方案，才于 1350 年完工，前后历时 177 年。

全塔建成后，塔顶中心偏离垂直中心线两米以上，南北高度相差 1.5 米，倾斜度令人吃惊。正是维持该塔不倒这个“合理倾斜度”，每年吸引着数千万游客慕名而来，前呼后拥地来猎奇观光，当地的旅游收入亦源源不断。如果哪个建筑师的头脑发热，硬要设法将斜塔扶正，这座堪称世界奇迹的古董就失去了生命力，比萨的财源就被切断。

站在比萨斜塔前，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伽利略。1590 年他在塔顶上作了著名的自由落体实验，将一枚十磅重和一枚一磅重的两个铁球同时从塔上抛下，结果两枚铁球同时落地。伽利略的实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关于“物体下落速度和重量成比例”的学说，纠正了持续 1900 年之久的“不同物体下落速度不同”的错误结论。

伽利略的时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各种新思想的出现和传播，从根本上动摇了千百年来束缚人们思想的传统教条和神学。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是对神权和封建反动势力的挑战，令企图维护旧秩序、阻挡历史前进的统治者万分恐惧。罗马宗教裁判所对宣传新思想，公开支持哥白尼“日心说”的伽利略判处了终身监禁；对宣传“日心说”反对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地心说”、严厉批判经院哲学和神学的布鲁诺视为异端，将他活活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上。刽子手们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封锁住真理的传播。

野蛮黑暗的欧洲中世纪，维护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所谓“宗教裁判所”是个地地道道充满恐怖与血腥的场所。在那里，真理会被谬误否决，科学要受神学的审判。当年的布鲁诺就是因坚持真理、崇尚科学被那些披着黑色道袍、道貌岸然的“上帝卫道士”们活活烧死的，这种野蛮行径，还可归罪于人类的愚昧无知。可悲的是，布鲁诺式悲剧历经 300 多年后仍在东方的中国重复，文革期间，中国的刽子手们以为割断张志新的喉管，杀掉林昭、遇罗克、王佩英就能封锁住真理的声音。这类封建法西斯残渣余孽永远不会明白：真理不可能用暴力去扑灭。

回顾历史，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只有记住黑暗与罪恶，才能远离黑暗与罪恶。聪明的统治者把记住历史作为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前进的出发点；愚昧无知的统治者则千方百计掩盖黑暗与罪恶，以强制遗忘证明自己永远“正确”。

九、风光旖旎的摩纳哥

3 月 21 日游完比萨当天就离开，晚上在意大利一个小镇克雷莫纳一家叫 IBIS(爱比斯)的酒家住下。第二天一早就向摩纳哥进发。天上下着濛濛细雨，公路两旁一片灰雾，我们无心观景，全都倒在座位上打盹，不知不觉大巴已穿过通往摩纳哥的 120 个山洞，到达地中海海边。天空已阳光灿烂，万里无云，一座漂亮的花园城市摩纳哥城已展现眼前。

摩纳哥城建在阿尔卑斯山脉突出地中海的一片悬崖上，这个袖珍小国占地仅 1.94 平方公里，十几万人口。虽然很小却美丽动人，它依山傍海，空气清新，是个五彩缤纷的滨海大公园。

首都摩纳哥城有 3 万人口，闻名世界的蒙特卡洛大赌场即设于此。该赌场建于 1865 年，140 多年以来曾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赌徒。赌徒们在此下注豪赌。为了把别人的钱算计到手，个个绞尽脑汁、明争暗斗。结局总是有的变成乞丐，有的变成巨富。我向来讨厌赌博，鄙视赌徒。走到赌场门口，根本不屑一顾。

游览摩纳哥，在乎的是它的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我与启昌沿着高低不平的石梯小路，逛遍老城区的大街小巷。先在前国王阿尔伯特一世（ALBERT I 1848-1922）执掌船舵的铜像前留影，再漫步绕过圣母玛利亚大教堂和海洋博物馆走到半山腰国王王宫。摩纳哥的国王们都在此料理公务。王宫广场飘扬着摩纳哥国旗，一名卫兵在王宫门前站岗。几名游人在此摄影闲逛，一切都显得那么安详。据说不久前去世的老国王兰尼埃三世，深受人民爱戴，常与市民零距离接触，从不担心人民谋杀。每次出行都轻车简从，不需警车开道，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政府官员也深知权力来自民众，根本不敢在群众面前摆架子、耍威风。他们不懂“过官瘾、玩特权”为何物，人民也不对其“侧目而视、重足而立，惧其为官”。

在摩纳哥短暂逗留，感受到它的自然生态之美，更感受到它的政治社会生态如此和谐。我们返回阿尔伯特一世铜像前，坐在长椅上，拿出从重庆带来的芝麻糊和饼干填进肚皮权作一顿午餐。海风徐徐吹来，头上几根癞毛毛已被风吹乱，在额角轻抚，这时候更加觉得心旷神怡、飘飘然若神仙过的日子。

十、激情奔放的法兰西

31

起源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大革命，曾使青春年少的我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提倡以人为本的思想先驱们，如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的人文主义思想已构成我人生价值观的基础，照亮了我前进的道路。从小我就会唱“哥哥华盛顿，弟弟拿破仑”这首儿歌，对法国有一种特殊感情。即将踏上法国土地之前，心情自然激动。

3 月 22 日傍晚，西天挂满彩霞，从摩纳哥出发转眼间就到了法国。路经南部大城市尼斯，夜宿海边小城戛纳。晚餐后下榻 KYRIAD（克雷德）旅店。夜幕降临，商店已关门，路上行人稀少，我们只有跟随汤导去逛逛海边，顺便在霓虹灯下看看举办国际戛纳电影节各个展区的外部景观。尼斯和戛纳原来都是意大利领土，十九世纪中叶，撒丁王国伊曼努尔二世完成意大利统一，得到法国的支持和帮助。将这块地盘作为礼物赠予了法国。

3 月 23 日清晨，汤导忽然通知提前出发。原定于上午 10 点去巴黎的高速火车因司机罢工只有改乘上午 7 点这趟车。6:50 进入车站，从尼斯开来的列车准时到达。戛纳至巴黎 930 公里的路程仅五个小时就进入巴黎市区。刚跨出古老的巴黎火车站，迎接我们的旅游大巴已在车站广场等候，一切安排都环环相扣。

巴黎是我仰慕已久的国际大都会。早在 1949 年冬天，父亲有个得意门生李炳炎由甘肃去法国路经成都，拜访父亲后就住在我们家，与我同住一间屋。他见我勤奋好学，便动员我随他赴巴黎求学，一切费用都由他负责。这位李叔叔是云南白药发明人曲焕章的亲外侄，其主要亲属均定居法国，在法国拥有巨额财产，家境宽裕、生活阔绰，供一个 14 岁的少年读书如拔一根毫毛。在李叔叔的劝说下，我心猿意马，决心难下。既向往留洋异国，又舍不得离开妈妈，她千辛万苦把我从山东老家带出来，母子相依为命难以割舍。反复思量，赴法留学之梦只好作罢。想起这段陈年往事，勾起许多辛酸痛苦经历的回忆，假如当年去了法国，决不会遭遇 1957 年那场横祸，人生道路又是一番

景色。如今到了法国心情还是轻松了很多。61年之后终于圆了赴法之梦，自我感觉既是旅游又是求学。

参加工作后，法国大革命的纲领《人权和公民宣言》曾激励过我。它向世界庄严宣告：“人人生而自由平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人类只要遵守这个原则，世界上就不会有剥削和压迫。50年代教哲学时，还崇尚过巴黎公社的分配原则。激情奔放的法兰西在我心中远远超过冷酷专制的俄罗斯。

十一、“你先请”！

3月22日中午，提前三小时到巴黎，下午有充裕时间游览塞纳河。只需一个多小时就把沿河的主要名胜古迹从船上浏览了一遍。坐在游艇上观看两岸风光别有一番情趣，看到著名景点刚要拍照，便一闪而过。拍下的照片大多是些残次品。

登岸后被汤导带进巴黎著名的“春天”免税商场购物。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我无欲无求，与启昌相约迅速溜出商场，找到一个公交车站坐在候车的木椅上观赏巴黎市容和匆匆的过客。我发现横穿公路斑马线，不论红灯绿灯，汽车都主动谦让行人：“你先请”！我突然想起1948年读过的一篇《西方日报》，有个小故事叫《怀孕五十年》，说的是英国有对刚结婚的绅士夫妇，为了让胎儿享受礼仪之邦的传统胎教，特意定居北京。夫人怀孕五十年，胎儿始终未降生便不幸去世，绅士丈夫为解开这个迷，给死妻作了剖腹产，两个活鲜鲜的婴儿已满头白发，弯腰驼背地在相互作揖鞠躬，口中念念有词：“你先请！”“你先请！”谁也不肯先出生。故事挖苦所谓礼仪之邦的虚伪文明。现实版的“你先请”却令人感动，它体现的是对人的尊重，对他人生命的尊重。我故意在红灯时刻走下斑马线，一辆轿车戛然而止，车窗外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示意我：“你先请”！我又在其他城市试过，规则都是如此。“你先请！”

我不得不想到，身在重庆，汽车与行人抢道的事已见惯不惊。近几年，有好几次汽车差点从我身上一碾而过。若非警惕性高，我早已化作肉酱。在中国，富家子弟飙车碾死人，毫无同情心，充其量拿出几个臭钱就可摆平。

十二、王宫掠影

巴黎的景点很多，最精彩的还是两处王宫——凡尔赛宫和卢浮宫。

3月24日早上，原大巴司机伊萨克已开车由戛纳赶来巴黎，我们在郊外旅店相遇，彼此已是老相识，和我一番寒暄，还教了我一句法语：“笨猪”！即早安之意。法国人早上见面都亲切地称对方“笨猪”。我立即学以致用，在餐厅见了法国人就叫“笨猪”。对方以同样的称呼微笑着回报我一句“笨猪”！

伊萨克这位46岁的奥地利男子比我小20岁。既是司机又是老板，大巴是他私人的。他驾车平稳安全，工作认真负责，从不迟到早退。每次外出参观都亲自为旅客上下行李。准备就绪使用新学的中国话对大家说：“来齐了，上车吧！”说完便驾车向凡尔赛方向驶去。

凡尔赛，原来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狩猎场所。当年的王公贵族在这片环境优美的丛林打猎、赛马、玩高尔夫球。路易十四亲政后，将王宫由巴黎搬到凡尔赛，路易十四五岁登基，由母后安娜代为摄政。23岁正式亲政，他担心大权旁落、群臣造反，把众大臣全部迁移到凡尔赛宫附近居住。天天与其朝夕相处，向他“早请示、晚汇报”，与自己一同饮酒作乐，在国王的眼皮底下享受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通过这种方式对众大臣严密控制，使其无暇与外界接触、相互串联谋反夺权。路易十四还时常与大臣们同台表演歌舞，自己扮演阿波罗太阳神，众臣如群星拱月以他为核心围绕他身边转。“太阳神”的美誉由此而来。

路易十四在位 72 年。在他亲政的五十多年里创造了无数辉煌，与中国的康熙皇帝极为相似。他大权独揽，实行绝对君主制，又善于听取、尊重大臣们的意见，把“集中”与“民主”巧妙地结合，促使了法国政局的稳定，带领法国走向强盛。这一时期法国领土大为扩张，政治、经济、文化都欣欣向荣。于是路易十四决心动用巨款，营造凡尔赛宫。36000 名工人在著名的艺术家和建筑家的指挥下，用 50 年时间造就了这一盖世杰作。整座宫殿富丽堂皇、雍容华贵。室内配有豪华的家具、花毯、多枝烛台。天花板上是著名绘画大师布朗的画，四壁和走廊金碧辉煌。展厅陈列着各种珍稀古玩，几乎集中了法兰西的全部珍宝，驻足观看令人眼花缭乱。

宫殿外的御花园，设计精致典雅，排列有序的花坛、各种林木和数不清的喷泉蔚为壮观。太阳神驾着金马车喷薄而出，各路女神分布在周围与太阳神交相辉映，雕像处处体现着太阳王的专制意志。这座法国式的大花园堪称园林典范，游人到此，无不为其如此完美而惊叹。

路易十四时代，凡尔赛宫是政权的中心，巴黎作为首都已形同虚设。1870 年，德皇威廉一世率军包围巴黎时，曾以凡尔赛宫为司令部。战胜了拿破仑三世，又于 1871 年在此加冕。战胜国的皇帝在战败国的王宫加冕，使主动挑起普法战争的拿破仑三世丢尽了脸。

由凡尔赛返回巴黎市区，在塞纳河沿岸看到仰慕已久的巴黎自由女神像。据说 1886 年法国人民赠送给美国那尊耸立于纽约哈德逊河口埃利斯岛上的自由女神像和这件作品出于同一雕塑家奥古斯特·巴托第之手。巴黎这座自由女神铜像尺寸虽然略小，但依旧光彩夺目、仪态万方。自由女神是自由的象征，她右手高举自由的火炬，脚上还有被挣断了的锁链。自由民主精神冲破了专制独裁的黑暗，给人类带来光明与希望，开启了科学与理性之门。人类终于懂得了，人应该是自由的，人的精神也应该是自由的。马克思说过：“自由民主精神使人们认识到自己是人。”源自欧洲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同各类专制制度的较量中，经历了 100 多年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终于变成了一种最好的社会生活方式为世界人民所广泛接受。自由民主精神将永远引领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3 月 25 日，我们参观了卢浮宫，并聘请巴黎的专职导游解说。卢浮宫曾经是法国历代国王的宫殿，现已改为法国国家博物馆和艺术陈列馆。半天时间只能跑马观花浏览其中的一部分。这座艺术宝库收藏了各个历史时期的雕塑、绘画、美术、工艺等罕世珍宝 40 多万件。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卢浮宫的“镇馆三宝”：一是举世闻名的达·芬奇名画《蒙娜丽莎》肖像，她那双永远微笑的眼睛，妩媚动人，只要见她一眼就会映入瞳仁之底终生难忘。二是断臂维纳斯（Venus）大理石雕像。1951 年夏天，我在成都人民公园美术馆学画时，曾临摹过维纳斯石膏像，如今见到原作格外兴奋。我凑上前去近距离抚摸了一下这位希腊神话中的爱神、美神和执掌生育与航海之女神。她身上的肌肉、血管、腰上的飘带都极为传神逼真。我由衷地佩服古希腊的雕塑大师的雕刻技艺炉火纯青。据说，维纳斯雕像是 1820 年在爱琴海米罗岛的一个山洞里发现的。它被法国大使花重金从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买下，献给了国王路易十八。三是萨莫色雷斯胜利女神，这是一尊无头断臂、体型丰满、双翅展开的残破大理石作品。大约公元前 190 年，罗得岛的雕塑家们为纪念塞浦路斯海战胜利，创作了这尊 3.28 米高的胜利女神竖立在该岛上。历经多年战乱，雕像早已被毁弃。1863 年被人在萨莫色雷斯岛上发现时已是一堆碎块，经多年修复，才得以重新站立起来，至今仍风采不减当年，女神身材健美，衣袂飘然，展开双翼从天空徜徉而降。遗憾的是，已无法鉴赏这位美女的完整芳容。

卢浮宫陈列馆的许多油画，都是我渴望已久的艺术精品。如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战役，拿破仑率领军队翻越阿尔卑斯山和拿破仑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的历史场面都一一展现眼前。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为后代的艺术创作留下了取之不尽的灵感。

我对卢浮宫展品的好感是它把君主与平民一视同仁陈列在王宫。王宫内挂着历代国王的油画肖像，还有许多建造卢浮宫的设计师、画家和工匠们的肖像。平民与国王的肖像并列供人瞻仰。国王

有如此气度，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难以想象。中国的专制帝王如楚平王、秦始皇之流，一旦宫殿或陵墓落成，建造的工匠均被处死殉葬。这就是东西方国家价值观念的差异。中国人的专制意识已渗入到骨髓和灵魂。

十三、从凯旋门到巴黎圣母院

巴黎的凯旋门最为雄伟壮观。罗马的君士坦丁凯旋门和因斯布鲁克凯旋门根本无法与其相比。这座凯旋门系 1806 年拿破仑下令兴建，遗憾的是这位雄才大略的统帅未能在此检阅凯旋的将士，就被波旁王朝的复辟势力推翻。凯旋门的修建一拖就是 30 年，于 1836 年正式竣工。拿破仑在被放逐的圣赫伦纳岛上已去世多年，新掌权的是奥尔良王朝的独裁者路易·菲利普国王。他不仅未全盘否定已被推翻的前任，还特意于 1840 年从圣赫伦纳岛将拿破仑的遗体迎接回来，庄重地从凯旋门经过再送往荣誉军人院安葬，以遂拿破仑的遗愿。如此宽广的胸怀与当今一些小肚鸡肠的统治者相比，路易·菲利普绝不掩饰自己昏庸无能就回避已被推翻前任的卓越功勋。更未用篡改历史的卑劣手法羞辱死去的前任。他给予拿破仑遗体应有的礼遇，正是对这位为法兰西的崛起和制订了后世传承的《拿破仑法典》的英雄人物的充分肯定。这样做，只会为执政者自己赢得好名声。路易·菲利普的壮举，在当今中国能找到几人？

游完凯旋门，穿过香榭丽大道不远处就是埃菲尔铁塔，我们来到巴黎已多次光临。听说铁塔顶端每晚都备有特殊佳肴——肉质鲜嫩的白色荷兰乳幼牛的烤牛肉，每克 80 欧元。若好胃口的游客吃上一斤需要人民币 40 万元。如此昂贵的价格，每晚都座无虚席，前来订座排队至少需要半个月以前。

巴黎的名胜古迹，还有我心仪神往的巴黎圣母院，60 年代读过雨果的小说，80 年代又看过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故事情节印象很深。走进这座中世纪哥特式石砌大教堂，仿佛自己也融入当年的故事情节中。教堂建在市中心塞纳河的西堤岛上，800 多年来它一直是巴黎的心脏，从 1163 年重新奠基兴建，1345 年才正式完工，历时 180 余年。教堂不仅因其古老宏伟而被誉为“建筑史上用巨大石头组成的交响乐”，更因雨果的同名小说而闻名。自从 1831 年《巴黎圣母院》这一不朽名著的发表，便给古老的圣母院增添了更多的辉煌。教堂的拱壁设计得如行云流水，优雅精致。纪念馆内的众多绘画、雕像和美轮美奂的彩色玻璃花窗都让游人眼花缭乱。几百年来，她目睹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如，路易十四的婚礼大典，拿破仑称帝的加冕仪式都在此举行。游人们登上高高的钟楼鸟瞰巴黎市景，就会想起那位心地善良的钟楼怪人卡西莫多，想起靠卖艺为生的美丽吉普赛女郎艾斯美拉达。那位见义勇为的丑八怪甘愿死在美女的身旁，那位吉普赛女郎在钟楼广场翩翩起舞的靓影，随着音乐节拍旋转、轻盈飘逸的舞姿，至今还令人陶醉和心花怒放。

从巴黎圣母院出来，走近广场中心有一块圆形的里程碑。这是法国的零公里处。从巴黎到法国各地的路程，都从这儿开始计算。我和启昌出于好奇，都下意识地伸手亲密接触了一下这块铜制的“零起点”。

十四、巴黎警察执法联想

3 月 26 日的行程安排是去“老佛爷”（法国英雄 LAFAYETTE 的译音）商场购物。路过协和广场顺便下车观光。广场中心矗立着高高的卢克瑟尔方碑，据说是 1831 年埃及国王送给法国国王路易·菲利普的礼物。看到协和广场就会想到路易十六。这位不善治理国家的昏庸国王，还有点小聪明，平时喜欢摆弄一些小玩意儿。他研究改进了老式断头台的斩首机，建议把刀刃改成斜形，可锋利无比地把人头割下来，避免刀口卷刃的麻烦。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法国大革命期间，这位断头台的设计者和他的王后玛丽·安东奈特也在这个处决人犯的广场被国民公会送上了他设计改良的断头台。时间是 1793 年 1 月 21 日。这类历史玩笑，总是在不断地嘲弄那些作法自毙的愚蠢的统治者。他们

万万想不到，聪明反被聪明误。连心狠手毒不断按比例“制造”“反革命”的人，自己也有一天变成了“反革命家属”。

“老佛爷”商场是巴黎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那里的法国香水、新潮服饰吸引着不少追求时髦者的眼球。同来的游客充分利用逛商场之机疯狂购物。七老八十的我，只得勉强尾随其后，浏览几个货架便匆匆溜出，约启昌一起去逛马路。我们不敢走远，只有到商场附近的巴黎歌剧院，坐在剧院门口石梯上晒太阳，顺便欣赏几个黑人表演街舞。

返程中听说我们旅行团有小夫妻在“老佛爷”商场购物时被警察抓走。他们使用从朋友处借来的购物卡付款，由于签名与原卡信息不符，售货员立即报警。警察赶来把这对小夫妻带到附近警局调查了一宿。第二天一早查明了真相，确认该卡并非盗窃，警方立即承认失误，给予赔礼道歉，弥补损失。警方对执法失误并不躲闪，含含糊糊。虽然一件小事，我还是联想到当今中国。几十年来一些执法者甚至执政者压根儿就不知向蒙冤受害者赔礼道歉为何物，似乎他们抓了你是对的，放了你也对，甚至打死你，让你“躲猫猫死”、“洗脸死”，他们通通都是对的，从来不需要向受害者说声“对不起”。他们以为只要对冤假错案坚持不认错的原则，自己就永远正确。我想起60年代有一部讽刺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其中有一句台词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当晚还有个游览项目是登上巴黎的最高建筑——210米高的蒙柏纳斯大厦。站在顶楼望去，巴黎市容及大小建筑尽收眼底。320米高的埃菲尔铁塔远远望去就像一根渺小的火柴棍。难怪一些居高临下的当权者，从不把底层百姓当人看。原来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底层百姓在高高在上的统治者眼里，只不过是一群渺小的蝼蚁。据说，狗之所以咬人，是因为在狗的眼中，人类均为侏儒。

参观完毕，巴黎三日游亦到此结束。

十五、在反思中崛起的德意志民族

3月26日，我们离开巴黎前往德国的斯图加特，几乎整天都在赶路。大巴穿过法国东部平原，路过盛产香槟酒的梅斯。当快要靠近德国边界小镇麦茨时，大巴突然熄了火。这下急坏了驾驶员伊萨克，他好不容易把车开到路边一个停车场，爬在车下连续修理两个多小时。我们在附近林区和河沟溜达得已不耐烦，伊萨克忽然兴奋地喊：“上车了！”傍晚到达斯图加特，外面下着小雨，晚饭后都已疲惫不堪，迷迷糊糊地住进了HOLIEAYINN旅店。启昌倒头便呼呼大睡，我反而累得难以入眠。躺在床上一直在想：二战后的战败国德国为什么短期内能从一片战争废墟上迅速崛起？

这十来天的旅行，我的直观印象是，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要高于欧洲各国。它的市政建设、乡镇房舍、环保措施等方面都很先进，田野风光也亮丽得多。即使旅店的自助早餐，品种和数量也比其他国家丰盛得多，样样皆首屈一指。德国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这么好？我认为受益于对过去历史的反思。

人所共知，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曾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1914年德皇威廉二世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39年纳粹德国头目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了最黑暗最惨痛的一页，无数生命和家园在战火劫难中消亡。二战中仅被德国法西斯杀害的犹太人就有600多万。

德国的领导人是如何对待自己国家过去这段不堪回首的历史？他们没有掩盖与回避，而是勇敢地正视。对历史罪恶的回避与正视，是对新执政的当权者能否引领国家进步的重大考验。1970年，刚上任不久的总理勃兰特去受害国波兰首都华沙访问，在二战期间被害的犹太人纪念碑前跪下了，他替所有必须下跪而没跪下的人跪下了。德国联邦政府勇敢地承担了战争的历史责任，以实际行动向二战中遭到德国法西斯迫害的受难者及其遗属赔礼道歉，并向他们支付了巨额的赔偿金。

德国的教育部门将二战中的法西斯暴行列为历史教科书的中心内容。他们反复强调“关键的任务是教育下一代，要将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职责视为己任。”善于反思自己历史的德意志民族，记住了历史上的惨痛教训，从不掩盖这些罪恶和污迹，在新的历史时期勤奋进取、自强不息。正因为他们伸张了公平与正义，才跨进了真理的门槛。德国执政者作出这一选择是明智之举，让受害者的心灵得到抚慰，历史上的积怨，也就冰融化解。甩掉历史包袱，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人们勤奋劳动，讲原则、守纪律，甘愿为社会奉献……这便是二战后德国迅速崛起，再次创造经济奇迹的主要动力。跪下的是勃兰特的双腿，站起来的是德意志民族。他们的经验归纳起来只有两点：一是不忘记历史，敢于公布历史的真相；二是敢于反思历史，不断总结历史教训。德国的崛起再次证明，一个忘记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政权，企图掩盖、封锁历史真相，甚至伪造、篡改历史，强迫人民遗忘历史的政权，绝对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政权。想清楚了这些道理，我痛痛快快地睡了一大觉。

十六、风景如画的瑞士

3月27日上午，从斯图加特乘车南下，进入瑞士后从巴塞尔和苏黎世城边经过，中午到达瑞士中部的高原城市琉森（又译卢塞恩），这座城市美极了，湖光山色相映成趣，成群的天鹅和各种水鸟在波光粼粼的琉森湖面上缓缓游动，游人坐在湖边长椅上谈笑或在草坪上悠闲散步。登上琉森的游船顶层，环顾周围群山和城市建筑，琉森就像一只漂亮的大蚌壳，闪闪发光的琉森湖好似蚌壳内一颗晶莹的大珍珠。琉森湖湖水清澈，两岸别墅成群，游船在湖面滑行，将平缓如镜的湖水划出一条长痕，如诗如画的山水美景，令人心旷神怡仿佛是童话中的仙境。

登岸后与启昌走向湖边石栏杆，有几只天鹅与野鸭在湖边觅食。启昌捏碎一块面包把碎渣抛入湖中，附近的天鹅和各类水鸟纷纷成群结队游向岸边，争抢投入的食物。我们坐在湖边长椅上观赏水禽之逍遥，其乐也融融。一切都那么和谐自然。此时此刻，即使再大的忧愁烦恼都会忘得一干二净。

琉森城内有条狭窄的小街，两旁有好几家中国人开的商店。女老板是广东人，热情地向我们介绍商品，完全不知这两个老头皆一毛不拔之铁公鸡。我们的目标是沿着此路去看著名的景点“狮子纪念碑”。这座纪念碑雕刻在整块崖壁上，是丹麦雕刻家特尔巴尔森所设计，专为纪念1792年8月10日在法国牺牲的786名瑞士雇佣兵。他们在保卫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及其家族的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这所大型摩崖石碑即为他们的绝对忠诚而建。本来这些雇佣兵可以在他国大革命中保持中立，或反戈一击站在革命人民一边，或举手投降以保全性命，或干脆逃跑一走了之。可是，谁也没有这样做，个个都对出钱雇自己的主子法王路易十六绝对忠诚，宁愿肝脑涂地，也不举手投降，他们个个都战死在沙场，赢得马革裹尸还。瑞士政府为嘉奖这786名雇佣兵的“忠义行为”，决定在琉森这座崖壁的浅穴中，雕刻了一头濒临死亡的雄狮。它的背脊被刺入一支锐利的箭头，面带哀伤与痛苦无力地匍匐在地面上。

石壁上雕刻的这头受伤的雄狮，具有一种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无论是谁看过之后都将终身难忘。难怪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把这座雕像称为“世界上最哀伤，最令人感动的石雕”。

瑞士是个英雄辈出的国家，反抗外国统治者的民族英雄威廉·泰尔的事迹早就熟悉。我不但收藏了一枚1923年发行的威廉·泰尔胸像大型的5法郎银币，还收藏了海尔维蒂时期1851年女神坐像招手的5法郎大银币以及19世纪伯尔尼、巴塞尔、洛桑、弗利布尔的5法郎银币。瑞士的铸币工艺与其制表业同样无与伦比。

瑞士境内多高原、湖泊，阿尔卑斯山是瑞士最为亮丽的一条风景线。也是这次旅游的必选项目。瑞士又是个千湖之国，从琉森出发大巴一直沿着湖泊行驶，当晚住在湖边一家小旅馆。窗外大雨整

夜下个不停，次日能否顺利登上阿尔卑斯雪山已忧心忡忡。启昌有些动摇，早餐时说了几句泄气话，汤导连忙找我“做思想工作”，以免动摇军心。老天有眼，大巴冒着雨奔向阿尔卑斯山脚下时，已雨过天晴。上午9点开始登山，远远望去天空明朗，皑皑白雪还有些刺眼，银白色的山坡陡斜雄伟，是滑雪的最佳环境。来自各地登山滑雪的运动健儿纷纷在大厅排队乘缆车上山。由山脚到山顶须换乘三次不同型号的缆车才能登上铁力雪山的安琪儿峰。最小的缆车坐4人，最大的可坐40余人。该峰约海拔3800公尺，终年积雪不断，但并不十分寒冷。山顶上鹅毛大雪，站立片刻便成“雪人”。抓把瑞雪放进口中，如同安琪儿赐予的玉液琼浆，舔一口数万年前的冰洞，如同品尝最古老的“冰激凌”。返回山顶室内大厅时，正在播放舞曲《蓝色的多瑙河》，我与启昌情不自禁地邀请来自武汉一位女士跳了几步华尔兹。在阿尔卑斯山最高峰跳华尔兹，今生永世都会感觉飘飘然。

十七、生存在夹缝的列支登士敦

从阿尔卑斯山一路下来，先是经历白雪皑皑的严冬，再是明媚阳光的春天。山上大雪飘飘，山下温暖宜人。已近中午两点，大巴仍在向列支登士敦急奔。早就饥肠辘辘、口渴难忍。汤导许诺到土耳其餐厅品尝特色风味大饼。老板是土耳其人，会说几句中国话：“你好，要不要洋葱？”大饼每人只有一个，里面夹着香肠、牛排、烤鸡肉、沙拉酱和洋葱。我已饥不择食，要了一个赶快找个地方去“蹲一蹲”。（汤导把列支登士敦戏称“在此蹲一蹲”。）3月28日这天恰逢星期天，首都瓦杜茨的大小商店几乎全部关门。我们只有在这个蕞尔小城逛街。看看教堂和王宫的外观。国王住在半山腰一座古老的城堡，管理着160平方公里的国土和3万臣民，首都5千人，以印刷精美邮票，铸造纪念币和制作假牙闻名。市内最有名的建筑是市政大厅。1788年德国大诗人歌德曾在这座石砌的古老建筑中居住过，门前有三匹造型奇特的奔马塑像，游人到此纷纷留影纪念。

列支登士敦夹在奥地利与瑞士之间。南有意大利、北有德国。国防由德、奥两国守卫边防哨卡，货币使用瑞士法郎。国防与经济均操控在他国之手，国家安全却安然无恙。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在佑助这个小国的生存？汤导说，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欧洲，国家主权彼此都得到尊重、小国不必担心会被大国吞并，大国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小国在邻国的尊重下，只要有人民支持作后盾，照样政权稳定。欧洲的其他小国也是如此。只有互相尊重才能并存共荣，才有世界和平。

十八、重游茵斯布鲁克

离开列支登士敦，重返茵斯布鲁克。不是为过路，而是住一宿。晚餐后在市内PREMIER旅店落脚。3月29日上午专程游览“黄金屋顶”。这所建筑外观与一般楼房无异，只是三楼正中有座宽敞的阳台，它的屋顶由若干黄金薄片铺就。阳光照射在黄金屋顶上，闪闪发光惹人注目。十七世纪奥地利的皇族们坐在阳台上欣赏广场上的各类演出。我的“傻瓜相机”只剩下两张底片，决心在此与汤彦合影留念。这位40多岁的大汉知识渊博，一路听他讲解获益多多。“随君半月游，胜读十年书”。这篇《欧洲旅游醒脑记》汤导功不可没。

在茵斯布鲁克还是难忘玛利亚·泰卢莎女王。1993年我在杨家坪邮币市场上买下一枚铸有女王头像的一塔勒银币，图案精美，铸工技艺在1780年就已达到高超精湛水平。我从女王的传记中知道一些有关她的生平，唯独不知发生在茵斯布鲁克的家庭不幸。1765年，女王赴茵市参加皇储儿利奥波德的婚庆，丈夫弗兰茨·斯特凡突然心脏病发作病逝于此。女王悲痛欲绝，特在茵市建凯旋门一座以示怀念。

十九、最遗憾是物价太高

十五天的欧洲游即将结束，我还未解囊购物。欧洲八国物价普通高出中国10倍，且许多产品乃产自中国。我何苦徒劳往返，当“运输大队长”？这是自我安慰，深层原因还是囊中羞涩。一只普通手表折合人民币一万多，一瓶香水两千多，一条皮腰带也要一千多。买个面包25元，一瓶矿

泉水 20 元，一块巧克力 20 元，即使上个厕所也要 15 元。如此昂贵的物价，我必须克制，决不当“冤大头”。早在佛罗伦萨时，皮带扣就坏了，商店询价最低都在千元以上，在重庆购买不过 20 来元，我又何苦？启昌为我谋划，将皮带反塞在铁圈内，可防裤子滑落。此法坚持了十几天倒也相安无事。不巧进入慕尼黑机场安检门，皮带发出“嘟嘟”尖叫声，引起了两位女郎的警惕。她们立即拦住我，示意解开裤袋查个仔细。当两位金发女郎看到腰带如此狼狈，撅起小嘴皱着眉，笑得腰都直不起。3 月 29 日由慕尼黑飞往北京已是 3 月 30 日中午。在机场休息了几个小时，又搭乘飞重庆航班回到家里。

一路上虽然克制购物欲，临走前在慕尼黑还是买下两样纪念品。一只精密的德制血压计和一只温度计，刚好 100 美元。还差两欧元是从一位兰州老头手上以 10:1 的人民币换来的。这 100 美元还是去台湾前在中国银行兑换的，没舍得用还夹在皮包里。谢天谢地，我并未空手而归，终于带回了两件小礼物。

二十、最重要的礼物是“醒脑记”

亲历西方国家，耳闻目睹，豁然开朗；仔细想想，大彻大悟。“西方那一套”并非政客所言那么恐怖。恰好相反，西方国家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社会稳定，人民幸福。这一切都离不开“西方那一套”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正如邓小平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西方那一套”的精髓是实行“三权分立”，多党互相监督制约的政治制度。这套制度从根本上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将统治者关在笼子里使其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危害人民。假如“照搬西方那一套”，人民就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领导者，不称职的饭桶随时都会被罢免和废黜；假如“照搬西方那一套”民主与法制，将会铲除官员们赖以劫夺财富的基础，强迫他们吐出非法到手的利益。他们必须接受独立的反贪局的调查，被送上法庭审判，被送进监狱，甚至被押往刑场枪决。假如“照搬西方那一套”，以权谋私者、贪污腐败者、专制独裁者都将面临灭顶之灾。他们对“西方那一套”发自内心的反感、痛恨和恐惧。拼命地诋毁普世价值，拼命地抵制政治体制改革，企图保住自己窃取的权力和既得利益。为抗拒民主潮流，前些年他们借口“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素质低，不具备实行民主的条件”来阻挠政治改革。如今，又换了新花招，说中国的政治模式优越无比，不仅不需要改革，全世界还得向中国学习。

这种权力不许监督的政权模式，对贪腐者最有利。他们一旦尝到权力为自己带来的好处，就再也不愿意放弃。时刻都害怕失去手中的权力。“西方那一套”最大的威胁，是随时都可剥夺贪腐者手中的权力，把贪腐者、独裁者、以权谋私者置于死地。这些人都是靠人民的鲜血养肥自己的。他们怎么会心甘情愿把喝进肚子的血吐出来？怎么会容忍自己被关进笼子里，让人民监督自己？如此看来，这才是隐藏在“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背后的真正秘密。

总之，这趟欧洲八国游已达到预期目的：既实现了少年时代的梦想，又识破了某些政客的真面目。在大量客观事实面前，以亲历的所见所闻，戳穿了谎言，剥开了他们的画皮，脑筋也更加清醒了。自我感觉：这一趟没有白来，这一辈子也没有白活。

2010 年 4 月初稿

9 月 6 日修改

“家庭出身”的符咒

○冰玄

在毛泽东时代，无论什么样的人，哪怕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在户口登记表册或人事档案中，除姓名、年龄、籍贯、学历、简历、本人成份等项外，还必须填写“家庭出身”。家庭出身以父亲从事的社会职业界定，父亲是什么的“阶级”，子女们的家庭出身便是什么样的阶级，无论升学、就业、参军，入团，都要审查他们的“家庭出身”，追溯祖宗三代的政治面貌，确认隶属于哪一个阶级。入党、提干就更加严格，必须组织人马四处核实。按传统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观念，出身于敌对阶级的人，无一不饱受各方面的歧视，表现再好则被疑“伪装”，学有所长则被视为“走白专道路”。

中共执政初期，“家庭出身”的填写不外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阶级、中农阶级、贫农阶级以及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等八大类。我在云南和平解放后实行军事管制时期，当上了一名警察，称为“参加革命”。局里的各级领导大多是由军队调配来的军人担任，原有的旧警察因工作需要，继续供职，称为“留用人员”，或称“起义人员”。我则被称为“新同志”，颇感自豪荣耀！

一位文化水平不高的军管干部在填写人事档案时问我：

“啥阶级出身？”

“无产阶级。”我回答说。这个名词是从舅舅口中听来的，他解放前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向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我知道工人、农民、劳苦大众都属于无产阶级。我的父亲是饭馆里的堂倌，我曾帮舅舅夜里在街头张贴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等类的标语；把传单偷偷扔进行人的提篮里，塞进商铺和居民住户的门缝里；利用自己年纪小、不引人注意的“优势”帮他传递情报。我因此自诩为也算是个“革命者”，自认为是纯正品牌的无产阶级出身。

“啥样的无产阶级？”这位军管干部来自山东农村，1948年3月当兵，胸前只挂着一块“渡江战役”的纪念章。接着问我：“你家里啥都没有吗？”

“有的。”

“有些啥？”

“一张木床、一张方桌、一张供桌、两个条凳、一把铜茶壶，碗筷一共……”

“得！得！得！有那么多东西算啥无产阶级，俺早就猜中你们城里人不可能是无产阶级。”

“那……我算啥阶级呀？”

“小资产阶级。”

后来申请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时，团支部书记审查我的申请后说：“小资产阶级入什么团，不行！”

一个留用人员对我说：“你去问问他，叫花子讨饭也有个碗、有根打狗棍，难道也是小资产阶级？”

我用这话找到总支书记申辩后说：“团章并没有规定小资产阶级不可以入团。”总支书记仔细问了我的三代家庭情况后，让我改为“贫民阶级”。

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公安部对“家庭出身”统一划分为地主、富农、贫农、雇农、工人、商人、旧职员、旧军人等类，把医生和教师归纳为“自由职业者”；从事算命卜卦和制作、贩卖香烛纸钱的，称为“迷信职业者”，不再使用“阶级”这个概念化的词语，于是，我的“家庭出身”就变成了“工人”。

1951—1956年我在派出所当户籍警察，塞满警察头脑的政治常识是：共产主义是天堂，资本主义是地狱，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放全人类，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不是共产党讲的话都是反动言论；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都是伪政府、反动政府；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都是伪军队、反动军队，他们的子女的“家庭出身”，在户籍档案里填写的是“伪官僚”或“伪军人”。他们中，被杀、关、管的子女，或因刑事犯罪被杀、关、管的子女，统称“反家属”，都必需另行建立《反革命社会活动基础》档案，纳入日常监控视线，防止他们因心怀不满而参与各种颠覆新中国政权的反革命活动……。

“家庭出身”这个政治怪胎，孕育于封建社会的“株连九族”，茁壮于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登峰造极，像一道邪恶的符咒，搅得周天寒彻，日月无光！全中国的青少年按父母的社会职业划为“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与“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两大群体。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黑帮、黑线人物的子女，也统统划归“黑五类”。

“红五类”的子女们被尊为老子英难的“好汉儿女”，威风十足，横行天下，任意打、砸、抢、抄、抓，堂堂的国家主席，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帅，施政一方的省委书记，都在他们面前像无助的蝼蚁，任其摆布，他们的子女也瞬间便从青云之上跌落到深渊之下……。

“黑五类”的子女们被咒为老子反动的“混蛋儿”或“狗崽子”，受尽各种精神上的凌辱，肉体上的伤害，有的流浪街头，有的逃出国门，有的被遽夺了宝贵的性命……湖南道县横岭中心小学教师蒋汉正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三个4—8岁的“狗崽子”也被造反派判处死刑，扔进岩洞中！大兴县造反派杀害的一个“狗崽子”，出生仅38天。24岁的北京青年遇罗克因为写了篇批评“家庭出身”的文章，便被冠以反革命罪，公审后枪决！

“黑五类”子女中，有的对父亲切齿痛恨而坚决与之“划清界线”；有的动员母亲离婚另嫁，以求改换门庭；许多成年的姑娘为摆脱家庭的影响，迫切另立门户，委身于丝毫也不喜欢、但“根红苗正”的丑老头；有的趁“上山下乡”到边疆农村插队务农之机，越境投奔缅甸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充当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以换取一段光荣历史……凡是勇敢地与父母划清界线，勇敢地参与揪斗亲生父母，勇敢地带领红卫兵抄自己的家，勇敢地“想贫下中农所想，急贫下中农所急”而献出处女贞操的，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政治怪胎产下的畸形儿，在人类史上绝无仅有，没听说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等超级恶魔的子女被论证可否“教育好”。肯定地说，著名于世的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袁家骝、吴健雄等人，倘若出生在这个怪胎里，绝对只能是“混蛋”，绝对成不了材。

时至今日，“家庭出身”依然是一道念念有词的符咒：“若要发，靠老爸”，“出国镀金，不如有个好父亲”，“爹娘有奔头，吃穿不用愁”……当年的“红五类”大都成了新贵，安富尊荣，纸醉金迷取代了阶级斗争，灯红酒绿取代了血雨腥风，他们的子女也都“日边红杏依云裁”，前程似锦，无忧无虑……当年的“黑五类”，大都生活在社会底层，终日为衣食住行苦苦奔忙，他们的子女也大都在就读、就业线上苦苦挣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家庭出身”这道念不完的符咒，是最具特色的中国“文化遗产”！